



大 会

Distr.: General
20 May 2019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理事会

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

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的函件、所审查案件、意见及开展的其他活动*

第 117 届会议(2019 年 2 月 11 日至 15 日)

一. 导言

1. 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于 2019 年 2 月 11 日至 15 日在萨拉热窝举行了第 117 届会议。
2. 工作组感谢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政府邀请工作组在萨拉热窝举行一届届会。工作组还感谢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驻地协调员办公室提供的支助。

二. 函件

3. 工作组在第 116 届和第 117 届会议之间的闭会期间，在紧急行动程序下向下列国家送达了 51 起案件：孟加拉国(1 起)、布隆迪(1 起)、埃及(34 起)、巴基斯坦(6 起)、卢旺达(1 起)、沙特阿拉伯(4 起)、苏丹(1 起)、阿拉伯联合酋长国(2 起)、越南(1 起)。

4. 工作组在第 117 届会议上决定向 19 个国家送达 261 起新举报的强迫失踪案件：阿尔及利亚(13 起)、孟加拉国(1 起)、布隆迪(12 起)、中国(1 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6 起)、埃及(10 起)、萨尔瓦多(2 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6 起)、肯尼亚(11 起)、黎巴嫩(1 起)、利比亚(1 起)、摩洛哥(24 起)、巴基斯坦(64 起)、俄罗斯联邦(40 起)、沙特阿拉伯(1 起)、斯里兰卡(6 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48 起)、乌克兰(2 起)、阿拉伯联合酋长国(2 起)。

* 本文件附件不译，原文照发。



5. 工作组还澄清了下列国家的 217 起案件：阿根廷(3 起)、埃及(97 起)、利比亚(1 起)、摩洛哥(14 起)、尼日利亚(1 起)、巴基斯坦(93 起)、沙特阿拉伯(6 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1 起)、土耳其(1 起)。27 起案件系根据政府提供的信息作出澄清，190 起案件系根据信息源提供的信息作出澄清。

6. 工作组在第 116 届和第 117 届会议之间的闭会期间，还单独或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一道，向下列国家送达了 18 封函件：6 封紧急呼吁，发往中国(1 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1 封)、以色列(1 封)、沙特阿拉伯(1 封)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2 封)；2 封即时干预函，发往伊拉克(1 封)和土库曼斯坦(1 封)；4 封指称函，发往厄立特里亚(1 封)、加纳(1 封)、冈比亚(1 封)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1 封)；6 封“其他函”，发往中国(1 封)、墨西哥(2 封)、欧洲联盟(1 封)、联合国政治事务部(1 封)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1 封)。

7. 于 2018 年 10 月 9 日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一道发布新闻稿，对秘鲁最高法院决定推翻对前总统阿尔韦托·藤森的赦免表示欢迎。¹

8. 于 2018 年 10 月 9 日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一道发布新闻稿，要求立即针对沙特记者、批评政府人士贾迈勒·卡舒吉的案件展开独立的国际调查。²

9. 工作组在向大会汇报过程中，于 2018 年 10 月 18 日发布新闻稿，对新出现的、非常令人关切的国家域外绑架做法表示关切。³

10. 于 2018 年 10 月 22 日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一道发布新闻稿，对危地马拉一项有关 Ixil Mayans 遭侵权情事的法庭裁决表示欢迎。⁴

11. 于 2018 年 10 月 31 日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一道发布关于“终止针对记者犯罪不受惩罚现象国际日”的新闻稿。⁵

12. 工作组于 2018 年 11 月 26 日发布新闻稿，对黎巴嫩一部禁止强迫失踪的新法律表示欢迎。⁶

13. 于 2018 年 11 月 28 日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一道发布新闻稿，对墨西哥最高法院就一部成问题的国内安全法作出的裁决表示欢迎。⁷

14. 工作组在第 117 届会议上还审查并通过了 4 项一般性指称，内容有关据报告《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宣言》在印度、巴基斯坦、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的实施遭遇阻碍。

¹ 见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3700&LangID=E。

² 见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3701&LangID=E。

³ 见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3736&LangID=E。

⁴ 见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3746&LangID=E。

⁵ 见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3803&LangID=E。

⁶ 见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3931&LangID=E。

⁷ 见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3942&LangID=E。

三. 其他活动

15. 工作组在届会期间会晤了强迫失踪受害人的亲属以及就强迫失踪问题开展工作的非政府组织。工作组还有机会在斯雷布雷尼察—波托卡里纪念中心和藏骨堂纪念馆(Spomen Kosturnica)向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侵犯人权情事受害人致敬。

16. 工作组在届会期间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埃及以及菲律宾政府的代表举行了会议。

四. 工作组本届会议上所审查国家的强迫或非自愿失踪信息

阿尔及利亚

标准程序

17. 工作组向阿尔及利亚政府送达了 13 起案件，事涉：

(a) Fethi Hab, 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是 1994 年 3 月在巴特纳省的塔祖勒特监狱；

(b) Khattab Hamadi, 据称于 1995 年 7 月 28 日在其位于奥兰的寓所前遭军事安全人员绑架；

(c) Ahmed Hadbi, 据称于 1995 年 3 月 10 日在其位于麦迪亚市“2 月 24 城”的住所遭阿尔及利亚国家人民军成员绑架；

(d) Ali Tamene, 据称于 1998 年 11 月 8 日晚 10 点在其位于迈奈耶勒堡的住所前遭军事安全人员绑架；

(e) Rachid Chemini, 据称于 1995 年 2 月 28 日在一艘停泊在奥兰港的船上遭军事安全人员绑架；

(f) Brahim Guettaf, 据称于 1994 年 10 月 2 日早晨 6 点在其位于麦迪亚省贝鲁阿吉耶区雷巴耶的住所遭军事安全人员绑架；

(g) Ali Ghazali, 据称于 1995 年 10 月 5 日在提帕萨省的瓦迪赦尔法遭达巴镇宪兵队代表绑架；

(h) Said Feid, 据称于 1998 年 12 月在其位于布米尔达斯省迈奈耶勒堡曼德加美勒的住所遭军事安全人员绑架；

(i) Lounes Feid, 据称于 1998 年 12 月在布米尔达斯省迈奈耶勒堡曼德加美勒的社区面包店前遭军事安全人员绑架；

(j) Mohamed Brahmi, 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是他 1997 年 11 月 27 日遭逮捕一周后，在布扎里亚的番图宪兵队；

(k) Omar Bentebiche, 据称于 1998 年 6 月 15 日在巴布瓦德社区遭警察绑架；

(l) Maamar Boudjellal, 据称于 1994 年 3 月 20 日晚 11 时左右与其父 Makhlof Boudjellal 一道在塞提夫的艾因阿宰勒遭艾因阿宰勒警方和宪兵队成员绑架；

(m) Mohamed Saleh Chaib, 据称于 1994 年 1 月 17 日在塞提夫省乌莱德特巴尼镇的萨阿德特巴尼中学遭宪兵队官员绑架。

重复案件

18. 工作组决定将 1 起案件视为重复案件。该案随即从工作组的记录中删除。

意见

19. 就上述案件(见第 17 段)而言，工作组收到信息源提供的消息称，阿尔及利亚政府在确定有权获得赔偿的受害人时采取歧视性做法。工作组希望回顾《宣言》第 19 条，其中规定：遭受被强迫失踪的人及其家属应得到补偿，并应有权得到充分的赔偿，包括得到尽可能完全恢复正常所需要的条件。如果受害者因被强迫失踪行为而死亡，他们的家属也应有权得到赔偿。

阿根廷

20. 工作组根据阿根廷政府此前提供的信息，决定澄清在第 115 届会议上适用了六个月规则的 3 起案件。上述案件事涉 Roque Ignacio Gioia、Martín Ogando Montesano 和一名女婴(见 A/HRC/WGEID/115/1 第 12 段)。据报告，已通过 DNA 测试确定了 Roque Ignacio Gioia 和 Martín Ogando Montesano 的遗骸，且已通知遗属。女婴被发现还活着，且已于 2017 年 12 月被确定了身份。

孟加拉国

紧急行动

21. 工作组于 2018 年 10 月 2 日在其紧急行动程序下向孟加拉国政府送达了 Mohammad Altaf Howlader 的案件。当事人据称于 2018 年 8 月 14 日遭杰索尔县快速行动营成员绑架。

标准程序

22. 工作组向孟加拉国政府送达了 1 起案件，事涉 Raju Islam。当事人据称遭达卡行政区警局侦探处人员逮捕。

意见

23. 工作组感到关切的是：工作组不断收到新举报的据称在孟加拉国遭强迫失踪的案件；孟加拉国政府对工作组的案件和函件不作答复。工作组强调：正如《宣言》第 7 条所规定的那样，不得援引任何特殊情况作为造成被强迫失踪的理由；根据第 10 条第 2 款，应将他们遭到拘留一事以及他们的拘留地点、包括转移的准确情况立即通知其家属、律师或任何其他有合法理由关心这种情况的人。

白俄罗斯

政府提供的信息

24. 白俄罗斯政府于 2018 年 8 月 31 日就 3 起待决案件提交了信息。工作组认为上述信息不足以澄清案件。

不丹

政府提供的信息

25. 不丹政府于 2018 年 10 月 24 日就 1 起案件提交了信息。工作组认为上述信息不足以澄清案件。

26. 工作组还按照其工作方法，向印度和尼泊尔政府发送了案卷副本。

布隆迪

紧急行动

27. 工作组于 2018 年 9 月 21 日在其紧急行动程序下向布隆迪政府送达了 Martin Ngenzemake 的案件。当事人据称于 2018 年 8 月 2 日在自己家中遭政府特工和“远见者”民兵组织成员绑架。

标准程序

28. 工作组向布隆迪政府送达了 12 起案件，事涉：

(a) Aimé-Aloys Manirakiza, 化名 Aimé Arakaza, 绰号 Musaga, 据称于 2017 年 5 月 25 日在坎约沙市郊遭“远见者”组织成员和负责保护国家警察机构的别动队绑架；

(b) Firmin Wakana, 又名“自由”，据称于 2016 年 1 月 13 日在其位于布琼布拉市纳汉瓜镇西比托克城区第 7 大道 113 号的家中遭西比托克警员、布隆迪武装部队、防爆旅以及“远见者”民兵组织成员绑架；

(c) Augustin Hatungimana, 化名 Tarpon Complaisant, 据称于 2015 年 12 月 9 日在布琼布拉市西比托克城区第 15 大道 101 号遭布隆迪国家情报局和国家警察局特工绑架；

(d) Jean-Paul Gahungu, 绰号 Matwi, 据称于 2016 年 12 月 8 日上午 10 时左右离开位于布琼布拉市基南多城区纳谬基扎大道的家时遭国家情报局特工绑架，国家警察局特工也可能参与了绑架；

(e) Evariste Nyandwi, 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是 2016 年 12 月 30 日晚 10 时在鲁塔纳省中部的一次歌舞表演上，据称已遭国家情报局成员绑架；

(f) Vianney Minani, 据称于 2017 年 2 月 17 日在布琼布拉乡村省姆提姆布兹市警察局遭代表国家情报局的警察和“远见者”组织成员绑架；

(g) Eric Ntirandekura, 据称于 2017 年 5 月 23 日晚 6 时在布班扎省姆潘达镇呼比哈区遭“远见者”组织成员与国家情报局特工联手绑架；

(h) Gaston Ntakarutimana, 据称于 2017 年 10 月 13 日早晨 5 时在布琼布拉姆提姆布兹市布特海赫城区玛哈姆亚遭身份不明者与姆提姆布兹市政代表联手绑架;

(i) Amatus Nshimirimana, 据称于 2017 年 3 月 21 日下午 1 时在布琼布拉市基纳马城区卡哈玛社区附近的 RN9 号公路沿线遭国家情报局代表和“远见者”组织成员绑架;

(j) André Surwavuba, 据称于 2016 年 6 月 8 日在布班扎省姆潘达镇基库巴山第 7 大道遭警方代表和“远见者”组织成员绑架，绑架地点距“团结民主运动”政党办公室不远;

(k) Oscar Honorable Ntasano, 据称于 2017 年 4 月 20 日在布琼布拉乡村省姆提姆布兹市卡加戛社区遭绑架。据称绑架者将他拉出车外(丰田海拉克斯双厢车，车牌号 D 1565 A)，蒙上眼睛，随后带往恩戈齐省;

(l) Munezero, 据称于 2017 年 2 月 21 日晚 7 时在基隆多省恩特加市基加加山恩廷多子山的住所遭市政当局以及“远见者”组织成员绑架。

意见

29. 就上述案件(见第 28 段)而言，工作组收到信息源提供的消息称，布隆迪的主管部门往往拒绝为投诉登记、未能启动调查或是有时在亲属试图提起投诉时对之进行威胁。工作组希望回顾《宣言》第 13 条第 1、第 3 和第 5 款。根据上述条款，每个国家应在任何知情或具有合法利益关系的人指称有人遭受强迫失踪时，确保前者有权向主管和独立的国家当局提出申诉并获得该当局对此申诉进行迅速、彻底和公正的调查。任何时候只要有合理的理由相信已发生被强迫失踪事件，即使没有人正式提出申诉，国家也应立即将此事交由该当局调查。不得采取任何措施取消或妨碍调查。此外，应采取步骤，确保所有与调查有关的人，包括申诉人、律师、证人和调查人员受到保护，免遭恶劣对待、恐吓或报复。最后，应采取步骤，保证对在提出申诉时或在调查程序期间出现的任何恶劣对待、恐吓或报复或任何形式的干涉予以应有的惩罚。

中国

联署紧急呼吁及答复

30. 2018 年 11 月 23 日，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一道，就据称在未予通知情况下转移李明哲的拘押地点和据称其妻李净瑜探视自己丈夫的要求被拒发出紧急呼吁。中国政府于 2018 年 12 月 27 日作出答复，提供了李明哲服刑监狱的名称，并表示李净瑜已探视过几次且将继续根据法律和规章安排探视。

标准程序

31. 工作组向中国政府送达了 1 起案件，事涉 Talati Gulinaer。当事人据称于 2017 年 12 月遭政府人员绑架并被带往一个再教育中心。

瑞典政府提供的信息

32. 2019 年 1 月 29 日，瑞典政府就中国案件录下的 1 起待决案件提供了信息。

联署“其他函”

33. 工作组于 2018 年 11 月 12 日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一道，就修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一事，送达了一封联署“其他函”。

信息源提供的信息

34. 工作组根据所提供的信息，决定重新启动高智晟的案件。

哥伦比亚

适用六个月规则

35. 哥伦比亚政府于 2018 年 9 月 25 日就 23 起待决案件提供了信息。工作组根据所提供的信息，决定对上述案件适用六个月规则。

政府提供的信息

36. 哥伦比亚政府于 2018 年 9 月 25 日就 5 起待决案件提供了信息。工作组认为上述信息不足以澄清案件。

重复案件

37. 工作组决定将 2 起案件视为重复案件。上述重复案件随即从工作组的记录中删除。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标准程序

38. 工作组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送达了 16 起案件，事涉：

(a) Taebong Kim, 据称于 1950 年 8 月 5 日在江原道遭朝鲜人民军成员逮捕；

(b) Youngchuk Park, 据称于 1950 年 6 月 2 日在首尔龙山区遭朝鲜人民军成员绑架；

(c) Inwon Yoon, 据称于 1950 年 7 月在首尔钟路区遭朝鲜人民军成员绑架；

(d) Jong-mu Do, 据称于 1970 年 6 月 5 日在黄海的海军舰艇 I-2 上遭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员绑架；

(e) Hyo-geun Yang, 据称于 1966 年 1 月 22 日在黄海公海水域的渔船吉龙号(Gilyong-ho)上遭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员绑架；

(f) Hyo-geun Yang, 据称于 1966 年 1 月 22 日在黄海公海水域的渔船吉龙号(Gilyong-ho)上遭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员绑架；

- (g) Jong-sik Lee, 据称于 1950 年 9 月 20 日在江原道春城郡遭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政事务局警察绑架;
- (h) Soon-geon Kim, 据称于 1950 年 8 月 7 日在首尔城北区遭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安全特工绑架;
- (i) Seong-bok Choi, 据称于 1968 年 7 月 10 日在江原道高城郡一艘名为 Manbok 的船上遭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官员绑架;
- (j) Eung-kwon Kim, 据称于 1968 年 7 月 2 日在渔业边界线附近的一条船上遭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艘小型武装船只的船员绑架;
- (k) Hong-gyun Kim, 据称于 1968 年 5 月 23 日在束草海岸外一艘名为大成号(Daeseong-ho)的船上遭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官员绑架;
- (l) Jong-yun Lee, 据称于 1964 年 3 月 20 日在大韩民国白翎岛附近一艘名为宝城 2 号(Boseung 2)的船上遭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士兵绑架;
- (m) Yang-su Park, 据称在“北方分界线”附近黄海上一艘名为 Odaeyang 61-ho 的船上遭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员绑架;
- (n) Sang-jun Kim, 据称于 1967 年 11 月 3 日在渔业边界线附近一艘名为 Haeyang-ho 的船上遭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官员绑架;
- (o) Tae-gil Park, 据称于 1964 年 3 月 20 日在大韩民国白翎岛附近一艘名为宝城 2 号(Boseung 2)的船上遭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士兵绑架;
- (p) Yeong-jun Choi, 据称于 1965 年 11 月 20 日在渔业边界线附近一艘名为明德号(Myeongdeok-ho)的船上遭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官员绑架。

39. 工作组还按照其工作方法, 向大韩民国政府发送了 6 起案卷的副本, 并向中国政府发送了 1 起案卷的副本。

政府提供的信息

40.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于 2018 年 10 月 18 日就 12 起待决案件提供了信息。工作组认为上述信息不足以澄清案件。

意见

41. 工作组仍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提供的标准化答复感到失望。工作组希望提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注意人权理事会第 21/4 号决议, 其中理事会促请各国与工作组合作, 帮助工作组切实履行其任务。

厄瓜多尔

政府提供的信息

42. 2018 年 12 月 21 日, 厄瓜多尔政府就 1 起待决案件提供了信息。工作组认为上述信息不足以澄清案件。

哥伦比亚政府提供的信息

43. 2018年12月21日，哥伦比亚政府就厄瓜多尔案件录下的1起待决案件提供了信息。工作组认为所提供的信息不足以澄清案件。

信息源提供的信息

44. 信息源就1起待决案件提供了信息。工作组认为上述信息不足以澄清案件。

埃及

紧急行动

45. 工作组在其紧急行动程序下向埃及政府送达了34起案件(见附件二)。

标准程序

46. 工作组在其标准程序下向埃及政府送达了10起案件，事涉：

(a) Abdurrahman Karim Fattouh Hamed, 据称于2018年3月12日在开罗省萨拉姆市遭警察和便衣人员绑架；

(b) Asmaa Saied Ahmed Mahmoud Ahmed, 据称于2018年4月15日在开罗机场遭身着便衣的国家安全部队成员绑架；

(c) Youssef Taha Ahmed Mohamed Taha, 据称于2016年2月10日在马斯里足球俱乐部遭身着便衣的国家安全部队成员绑架；

(d) Ahmed Magdi Abdelazim Ryiad Ismail, 据称于2017年12月21日在贝尼苏韦夫省的塞勒姆侯赛因大街遭身着便衣的国家安全部队官员绑架；

(e) Mohamed Ali Gharib Mosallam, 据称于2017年10月5日在开罗机场遭国家安全部队成员绑架；

(f) Assem Mohammed Mohammed Mashaheet, 据称于2018年6月25日在纳斯尔市遭身着平民服装和制服的警察逮捕；

(g) Mosaab Kamal Tawfik, 据称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是2018年11月在托拉监狱；

(h) Abdel Rahman Saad Saad Eid Noser, 据称于2018年9月23日在布哈拉省道瓦尔市遭身着制服和便衣的国家安全特工逮捕；

(i) Ahmed Shaker Abd El-Latif Abd al-Fattah Atta, 据称于2018年3月21日在开罗省扎赫拉纳斯尔市一个警方的临时检查站遭身着制服的警察逮捕；

(j) Nasr Rabie Abdelraouf Nasr Rabia, 据称于2018年2月13日在从纳斯尔市第七区前往开罗的路上遭身着便衣的国家安全部队成员绑架。

47. 工作组按照其工作方法，向马来西亚政府发送了Asmaa Saied Ahmed Mahmoud Ahmed案件的副本。

根据信息源提供的信息作出澄清

48. 工作组根据信息源提供的信息，决定澄清 15 起案件，事涉：Ali Mohamed Abdulhamid、Ibrahim Abdelwanis Ali Ismail Gad Allah、Aya Musaad Mohammed Mohammed al-Dahshan、Aya Musaad Mohammed Mohammed al-Dahshan、Abu Hassiba Mohammed Faraj、Afaf Hussein Salem Mahmoud、Omaima Hussein Salem、Amr Abou Hassiba Mohamed、Ayman Hussein Salem、Hussein Ayman Hussein Salem、Mohamed Yassin Abdel Wahab、Mohammed Jamal Ali Ibrahim、Abdurrahman Mohamed Adel Abdulsalam Eliwa、Ali Jamal Ali Salim、Osama Mabrouk Mousa Mohamed。据报告，上述人员中有 4 人在押，11 人已获释。

信息源提供的信息

49. 信息源就 9 起待决案件提供了信息。工作组认为上述信息不足以澄清案件。

适用六个月规则

50. 埃及政府于 2018 年 8 月 27 日、9 月 26 日、10 月 23 日、12 月 12 日、12 月 13 日以及 2019 年 1 月 2 日、1 月 15 日、1 月 22 日就 48 起待决案件提供了信息。工作组根据所提供的信息，决定对上述案件适用六个月规则。

政府提供的信息

51. 埃及政府于 2018 年 8 月 27 日、10 月 15 日、10 月 23 日、12 月 12 日、12 月 13 日以及 2019 年 1 月 2 日就 13 起案件提供了信息。工作组认为上述信息不足以澄清案件。

澄清

52. 工作组根据政府此前提供的信息，决定在六个月规则所规定期限到期之后或是信息源已发表意见之后，澄清 82 起此前适用了六个月规则的案件 (A/HRC/WGEID/115/1 第 40 段和 A/HRC/WGEID/116/1 第 59 段)。上述案件事涉：Mohamed Abdullah Mohamed Abdullah、Abdul Rahman Sherif Sayed Mohamed Abdul Wahab、Ahmed Saad Ahmed Ibrahim、Mohamed Shehata Mohammed Abdel-Hadi、Ibrahim Mohamed Sadiq、Hassan Farouk Sharaf、Mohamed Abdul Raheem Metwally Sayed Ahmed、Mohamed Rashad Ibrahim al-Tonoby、Mohammed Gamal Mohammed Mohammed Shehata、Ibrahim Motamid Amine Inani al-Jundi、Mahmoud Tawfik Abdalaal、Hani Said Kahla、Mosab Abdallah Abdelhamid Morsy Hamed、Abdullah Mohamed Saad Ahmed al-Samenoody、Ossama Mohammed Ezz al-Arab Mogahed、Fathi al-Sayed Afifi al-Sindyooony、Ahmed Mohammed Hassan Aweys、Ahmed Mohamed Mansy Hamad、Hussein Salih、Hamdi Taha Abdelrahim Elabasi、Omar Ali Elsayed Ahmed Bateekh、Khalaf Thabet Hardiy、Hussein Mohamed Hassan Farrag、Omar Tarek El Sayed Tarek El Sayed El Nomrosy、Ahmed Nasr El Din Abd al-Salam Radwan、Abdulrahman Mohamed Ibrahim al-Bih、Ahmed Sameh Mohamed Ahmed Mansour、Mohamad Jomaa Youssef Abdullah Zahra、Ahmed Fawzy Ahmed Hafez Marzouq、Zaïd Mohamed Ahmed Ahmed al-Bana、Ahmed Seif al-Islam Mostafa Mostafa Kamoun、Yousri Kamal Mohamed

Abdallah、Yehia Mansour Ahmed El Sharkawy、Fakhr El Din Youssef Zaki Abou El Azm、Taher Ahmed Gamal El Dein Mohamed、Haitham Fathey Ahmed al-Shandeney、Wasel Omar Mohamed Mohamed Wasel、Atieto Ali Saied Atieto、Atieto Mohamed Amubarek Abu Ahmed、Khedr Walaa Shaban Gomaa Ebrahim、Abdalrahman Fathy Abdalrahman Khalifa、Mostafa Morsi Khafagi、Ibrahim Rajab Ibrahim Arafat、Mohamed Fawzy Abo al-Gheet al-Tahan、Nasser Mohamed Zaki Mohamed、Mahmoud Ahmed Abdul Mawla Shaoot、Al-Said Mohamed Mohamed Ibrahem Dosoki、Magdy Abdel Halim Mohamed Zayed、Omar Mohamed Abd-Alwahed、Belal Mohamed Morsy Mehanna、Mohamed Mohamed al-Morsy al-Sayad、Ahmed Abdelazeem Mohamed Ahmed、Adel Ahmed Asaid Asobky、Asadat Abderahim Abdessalam Karim Edine、Ragab Mohamed Aly Mohamed El Gidaway、Sahl Abdul Basir Mohammed Tarab、Muhammed Kamal Muhammed Mandour、Naem Shalaby Yusuf Mahfouz、Yusuf Yusuf Yusuf al-Atawey、Ahmed Abdul Moneim Mohamed Abdul Ghani Zahran、Ammar Yasser Mostafa Ahmed Helal、Mohamed Abdel Maksoud Mohamed El Khayiat、Refa'at Refa'at Muhammad Abu Ghazala、Ahmad Lotfi Ahmad Zaghloul、Moaaz Bellah Khaled Fayyad Mohamed Abdelmoneim、Raid Mohammed Aouis Murtada、Saad Saad Ali Abdallah Khaled、Ahmed Abd-Allatif Ahmed Ali Al、Hassan Hassan Khalid Azzayyat、Muhammad Hammad Abdul-Ghani Saleem、Belal Atef Khalid Azzayyat、Abd-alrhman Yasser Nagib Dawod、Abdelrahmaan Ali Ali Mohamed Farag、Khaled Yousf Ab Allah Ahmed、Abo-Zaid Mohammad Mohammad al-Tonobi、Mahmoud Abdel Badea Mohamed Ahmed、Ahmed Mohamed Salem Ahmed、Ibrahim Abul Azm Mohamed Dawoud、Ibrahim Tarek Emad Nasr El Din、Loqman Mohamed Abdelfattah Mohamed、Ahmed Mowafi Khalafallah Ahmed、Magdi Khaled Mohamed Mohamed。据报告，有 71 人在押，11 人已获释。

联署紧急呼吁

53. 工作组于 2019 年 2 月 12 日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一道，就一位记者兼人权维护者遭逮捕并据称遭强迫失踪一事送达紧急呼吁。

对联署紧急呼吁的答复

54. 埃及政府于 2018 年 10 月 26 日针对 2018 年 5 月 9 日就诗人 Galal el Behairy 据称遭强迫失踪一事发出的联署紧急呼吁提交了答复。工作组感到遗憾的是，上述答复未触及有关 El Behairy 先生遭强迫失踪数日的指称，也未回答要求就针对 El Behairy 先生据称遭强迫失踪开展的任何调查提供信息的问题。

重复案件

55. 工作组决定将 1 起案件视为重复案件。上述重复案件随即从工作组的记录中删除。

意见

56. 工作组依然对针对 Ibrahim Abdelmonem Metwally Hegazy 采取的措施构成因其与工作组合作而对其实施的报复行为感到关切，并指出工作组依然在等待埃及政府就与该案有关的若干问题作出答复，其中包括为协助其签证申请而与工作

组举行会议的确认函是否作为一项不利于 Metwally 先生的证据附在刑事案卷当中(A/HRC/39/46, 第 96 段)。

57. 工作组感谢埃及政府作出了大量答复，但工作组提醒埃及政府，对诸多案件作出澄清并不能免除其在《宣言》之下承担的义务，其中包括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将来发生类似情况的义务。工作组感到关切的是，尽管一再呼吁埃及政府解决似为系统性问题的强迫失踪问题，尤其是短期强迫失踪问题，但情况似乎并未改善。工作组重申，要求埃及政府就此采取紧急行动(A/HRC/39/46, 第 95 段)。工作组还重申，工作组对埃及进行正式访问将有助于埃及政府解决上述问题。

萨尔瓦多

标准程序

58. 工作组在其标准程序下向萨尔瓦多政府送达了 2 起案件，事涉：

- (a) Josué Vladimir Henríquez Melgar, 据称于 2018 年 9 月 27 日在卢尔德国立研究所附近遭国家民警成员绑架；
- (b) Kevin Alexander Rivera, 于 2017 年 7 月 30 日在圣地亚哥—诺努阿尔科市的一个服务站遭国家民警成员绑架。

对一般性指称的答复

59. 萨尔瓦多政府于 2018 年 11 月 15 日针对 2015 年 3 月 31 日和 6 月 25 日发出的两项一般性指称提交了答复。答复全文载于附件四。

厄立特里亚

联署指称函

60. 工作组于 2018 年 10 月 16 日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一道，就 Berhane Abrehe 据称遭强迫失踪及其妻子 Almaz Habtenariam 遭隔离拘押一事发出联署函。

危地马拉

信息源提供的信息

61. 信息源就 1 起待决案件提供了信息。工作组认为上述信息不足以澄清案件。

新闻稿

62. 于 2018 年 10 月 22 日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一道发布新闻稿，对危地马拉一项有关 Ixil Mayans 遭侵权情事的法庭裁决表示欢迎(见第 10 段)。

意见

63. 本届会议上，工作组审议了所收到的如下信息：议会正在讨论的一项法案将修订该国的民族和解法，并对国内武装冲突期间实施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实行

大赦。工作组依然感到关切的是，批准上述改革将严重影响受害人获得公正、真相、赔偿和不再发生保证的权利。还可能导致受害人、法官、检察官、律师、原告、证人、专家及其他参与人权审判者遭到报复和攻击，使其个人安全及其家人的安全面临风险。

64. 工作组希望回顾《宣言》第 18 条第 1 款，其中指出，对于犯有或指称犯有强迫失踪罪行的人，不应适用任何特别赦免法律或其他可能使他们免受任何刑事诉讼或制裁的类似措施。

印度

65. 工作组收到可信信息源提供的信息称，《宣言》在印度的实施面临阻碍。于 2019 年 3 月 28 日向印度政府送达了一般性指称(见附件一)，指称的重点主要是印度查谟—克什米尔邦失踪人员的家人据称面临着困难，包括在获取信息和起诉犯罪者方面面临法律障碍、缺乏补救措施，以及缺乏适当的赔偿，包括缺乏康复机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标准程序

66. 工作组在其标准程序下向伊朗政府送达了 6 起待决案件，事涉：

- (a) Mohammad-Reza Behkish, 据称于 1982 年 3 月 15 日在德黑兰北部遭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革命卫队和安全部门成员绑架；
- (b) Mahmoud Behkish, 据称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是 1988 年 8 月 27 日在戈哈尔达什特监狱(即拉贾沙赫尔监狱)；
- (c) Mohammad-Ali Behkish, 据称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是 1988 年 8 月 27 日在戈哈尔达什特监狱(即拉贾沙赫尔监狱)；
- (d) Zahra Behkish, 据称于 1983 年 8 月 24 日在德黑兰遭革命卫队成员逮捕；
- (e) Mehrdad Panahi Shabestari, 据称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是 1988 年 8 月 31 日在埃温监狱；
- (f) Mohsen Behkish, 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是 1985 年 3 月在塔沃黑拘押中心(埃温监狱)。

政府提供的信息

67. 伊朗政府于 2018 年 11 月 19 日就 1 起待决案件提供了信息。工作组认为所提供的信息不足以澄清案件。

68. 工作组按照其工作方法，向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发送了一份所提供的信息的副本。

意见

69. 就上文所述案件(见第 66 段)而言，根据所收到的信息，与失踪者有关的人员收到了未经确认的失踪者死亡报告。工作组希望回顾，死亡未经确认，不应妨碍对据称发生的强迫失踪情事展开调查。工作组就此援引《宣言》第 13 条第 6 款，其中指出，应不断进行调查，直至查明被强迫失踪的人的命运为止。工作组还援引第 17 条第 1 款，其中指出，只要犯案者继续隐瞒失踪人员的命运和下落而且实际真相仍未查清，构成被强迫失踪的行为即应视为是一种继续犯罪。

70. 工作组重申感到遗憾的是，未收到伊朗政府就 2017 年 2 月 28 日送达的一般性指称提供的任何信息。上述一般性指称系关于据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未采取行动调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该国 5,000 名政治犯失踪和遭法外处决后坟墓未作标记且犯罪者有罪不罚一事(A/HRC/WGEID/111/1, 第 68 段和附件二)。

71. 工作组再次回顾，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曾同意工作组于 2004 年到访。访问在伊朗政府的要求下推迟。访问尚未可行，尽管工作组曾多次发函提醒并要求伊朗政府尽快确定访问日期。

伊拉克

即时干预函

72. 工作组于 2018 年 10 月 2 日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一道，就人权维护者 Imad al-Tamimi 据称遭任意逮捕、强迫失踪和酷刑以及人权维护者 Israa al-Djuraili 据称遭恐吓和威胁发出联署函。⁸

以色列

联署紧急呼吁

73. 工作组于 2019 年 1 月 25 日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一道，就一名巴勒斯坦人据称遭任意逮捕、强迫失踪和死亡及其家人据称遭报复一事发出联署函。

肯尼亚

标准程序

74. 工作组在其标准程序下向肯尼亚政府送达了 11 起案件，事涉：

- (a) Abdiweli Sheikh Ibrahim, 据称于 2015 年 4 月 21 日在拉穆镇曼德拉军营附近的家中遭反恐警队警官逮捕；
- (b) Abdirizak Haji Mohamed, 据称于 2015 年 10 月 24 日在曼德拉的家中遭肯尼亚国防军军官逮捕；
- (c) Ali Warsame, 据称于 2015 年 4 月 9 日在瓦吉尔镇乌拉雷市场遭肯尼亚警察预备役的代表绑架；

⁸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4111>。

(d) Ali Duale, 据称于 2015 年 4 月 14 日在瓦吉尔镇瓦戈巴雷地区的一家网吧遭行政警队和快速部署小队的代表绑架;

(e) Abdilatif Abdimalik, 据称于 2013 年 4 月 25 日在加里萨镇郊区的布拉塔克瓦社区的家中遭警察绑架;

(f) Asha Abdisalan, 据称于 2015 年 7 月 17 日在内罗毕伊斯特利区的家中遭行政警察成员和肯尼亚国防军军事情报官员绑架;

(g) Farah Ibrahim Korio, 据称于 2015 年 6 月 30 日在瓦吉尔镇的瓦吉尔警察局遭肯尼亚国防军和反恐警队的成员绑架;

(h) Hassan Derow, 据称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是 2015 年 3 月 21 日在瓦吉尔军营, 在他被转押至不明地点之前;

(i) Hussein Ali Abdullahi, 据称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是 2015 年 5 月 13 日在瓦吉尔军营;

(j) Mahat Isaak Ibrahim, 据称于 2015 年 4 月 20 日在瓦吉尔郡艾欧贝村的家门外遭肯尼亚国防军成员绑架;

(k) Omar Mohamed Yusuf, 据称于 2015 年 4 月 26 日在曼德拉镇的巴库里餐馆遭反恐警队和刑事调查局代表绑架。

意见

75. 工作组重申感到遗憾的是, 肯尼亚政府对工作组的函件不予回复, 其中包括三项一般性指称: 2014 年 9 月 30 日就反恐警队据报告实施的强迫失踪及其他侵犯人权情事送达的一般性指称(A/HRC/WGEID/104/1, 第 71 至第 78 段; A/HRC/30/38, 第 76 段); 2016 年 3 月 4 日送达的一般性指称, 内容包括涉恐嫌疑人在诸如 2014 年 4 月开展的“安全观察”行动等高压安全措施背景下遭强迫失踪(A/HRC/WGEID/108/1, 第 6 段); 2017 年 6 月 1 日就有报告称该国沿海地区青年穆斯林遭强迫失踪问题送达的一般性指称(A/HRC/WGEID/112/1, 第 59 段和附件三)。

科威特

政府提供的信息

76. 科威特政府于 2018 年 10 月 11 日就 1 起待决案件提供了信息。工作组认为上述信息不足以澄清案件。

77. 卡塔尔政府于 2018 年 10 月 20 日就 1 起待决案件提供了信息。工作组认为上述信息不足以澄清案件。

适用六个月规则

78. 沙特阿拉伯政府于 2019 年 1 月 21 日就 1 起待决案件(见第 76 至第 77 段)提供了信息。工作组根据所提供的信息, 决定对该案适用六个月规则。

黎巴嫩

标准程序

79. 工作组向黎巴嫩政府送达了 1 起案件，事涉叙利亚寻求庇护者 Diaa Ayouche。当事人据称于 2014 年 2 月在赫尔梅尔地区巴利萨村遭真主党一伙武装人员绑架。

新闻稿

80. 工作组于 2018 年 11 月 26 日发布新闻稿，对黎巴嫩一部禁止强迫失踪的新法律表示欢迎(见第 12 段)。

意见

81. 工作组希望黎巴嫩政府会对工作组有兴趣于 2019 年间访问该国的表示作出积极反应。

利比亚

根据信息源提供的信息作出澄清

82. 工作组根据信息源所提供的信息，决定澄清 Alzaeidi Fathi Salam Hamad 的案件。当事人目前在押。

马尔代夫

信息源提供的信息

83. 信息源就 1 起待决案件提供了信息。工作组认为上述信息不足以澄清案件。

政府提供的信息

84. 马尔代夫政府于 2018 年 12 月 21 日就 1 起待决案件提供了信息。工作组认为上述信息不足以澄清案件。

墨西哥

信息源提供的信息

85. 信息源就 5 起待决案件提供了信息。工作组认为上述信息不足以澄清案件。

新闻稿

86. 于 2018 年 11 月 28 日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一道发布新闻稿，对墨西哥最高法院就一项有问题的国内安全法作出的裁决表示欢迎(见第 13 段)。

联署“其他函”

87. 工作组于 2018 年 11 月 12 日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一道，就有关墨西哥《国家安全法》的讨论向最高法院发出了一份联署“其他函”。⁹

88. 工作组于 2019 年 2 月 4 日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一道，向墨西哥议会发出联署“其他函”，就创建军事国民警卫队的提案表示关切。¹⁰

摩洛哥

标准程序

89. 工作组向摩洛哥政府送达了 24 起案件，事涉：

(a) Mustapha Hassib, 据称于 1981 年 6 月 20 日在位于卡萨布兰卡西迪伯努西区 11 号胜利 2 区 53 座的家中遭移动干预公司和警方成员绑架；

(b) Mohamed Dadi, 据称于 1981 年 6 月 20 日在位于卡萨布兰卡西迪伯努西区 23 号胜利 1 区 1 座的家中与其兄弟 Abdelhak Dadi 一道遭移动干预公司和警方成员绑架；

(c) Abdelhak Dadi, 据称于 1981 年 6 月 20 日在位于卡萨布兰卡西迪伯努西区 23 号胜利 1 区 1 座的家中与其兄弟 Mohamed Dadi 一道遭移动干预公司成员和身着制服的警察绑架；

(d) Saleh Saoudi, 据称于 1981 年 6 月 20 日在位于卡萨布兰卡西迪伯努西区 6 号 46 座的家中遭移动干预公司和警方成员绑架；

(e) Bouchaïb Bakri, 据称于 1981 年 6 月 20 日在位于卡萨布兰卡西迪伯努西区 15 号 45 座的家中遭移动干预公司和警方成员绑架；

(f) Mouh Assim, 据称于 1981 年 6 月 20 日在前往艾因塞巴区钓鱼的路上遭卡萨布兰卡奥卡沙的武装部队成员绑架；

(g) Abdellatif Zeroual, 据称于 1974 年 11 月 5 日晚 7 时在卡萨布兰卡 Ziraoui 大街和 Zerkouni 大街交叉路口 20 米外一个公交车站附近遭国家刑警大队成员绑架；

(h) Ahmed Berhiche Ben Moussa, 据称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是 1977 年 10 月在盖尼特拉中央监狱；

(i) Belaid Bab Allah, 据称于 1963 年 2 月在卡萨布兰卡遭身着便衣的秘密警察成员绑架；

(j) Akka Harrouche, 在逃出位于扎埃尔路的名为“3 号固定点”的秘密拘押中心一周后，于 1975 年 7 月 20 日遭拉巴特地区艾因奥代宪兵团成员绑架；

(k) Abdessalem Ben Alami Laaroussi, 据称于 1956 年 8 月在迪瓦那遭摩洛哥解放军和民兵成员绑架；

⁹ 见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4199>。

¹⁰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4318>。

(l) Abu Zakaria Mohamed Benghazi, 又名 Mohamed El Abdi, 据称于 1973 年 2 月 10 日午夜前后在其工作地点, 即卡萨布兰卡赦哈拉扎德电影院遭秘密警察成员逮捕;

(m) Mohamed ben Ahmed Habbous, 据称于 1973 年 3 月 11 日在其位于梅克内斯 Tours la Touraine 6 号(现为 Hay Saada Zenkat Chouaib Doukali 6 号)的家中遭警察和协警成员绑架;

(n) Nayem Breica Ahaimad, 据称最后一次有人看到他是 1993 年在盖尼特拉监狱;

(o) Driss Gaga, 据称于 1981 年 6 月 20 日在卡萨布兰卡火车站遭国家安全局特工逮捕;

(p) Mohamed Faza, 据称在其位于卡萨布兰卡西迪伯努西区 39 区 Hay Tarek 街 36 号的家中遭摩洛哥皇家武装部队成员绑架;

(q) Haddou Sharif, 又名 Haddou Ben Lahcen, 据称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是 1963 年 3 月 1 日在拉巴特巴巴拉劳监狱;

(r) Brahim Sidi Hanin, 据称于 1976 年年初在法西亚遭摩洛哥皇家武装部队成员绑架;

(s) Hassanna Omar Skenna Ballaou, 据称于 1987 年 6 月 12 日上午在卡萨布兰卡执行公务时遭军队成员逮捕;

(t) Lehbib Mahmoud Dorachar, 据称于 1989 年 7 月 9 日在盖勒敏省遭其他军队人员绑架;

(u) Mustapha Belkacem Aanai, 据称于 1976 年 12 月 22 日在盖勒塔地区的德鲁阿遭武装部队成员绑架;

(v) Sidemmo Salma Mohamed Sid Ahmed, 据称于 1976 年 2 月在阿姆哈拉地区遭武装部队成员绑架;

(w) Hassan Moulabi, 据称于 1973 年 1 月 4 日在布兹尼盖市第二哈桑大道上的一家咖啡馆遭警察绑架;

(x) Mohamed Salek Najem, 据称于 1976 年 2 月在 El Bir Behlou 遭皇家武装部队成员绑架。

澄清

90. 工作组根据摩洛哥政府此前提供的信息, 决定在六个月规则所规定的期限到期后澄清 14 起案件(A/HRC/WGEID/115/1, 第 66 段)。

信息源提供的信息

91. 信息源就 15 起待决案件提供了信息。工作组认为上述信息不足以澄清案件。

政府提供的信息

92. 摩洛哥政府于 2018 年 9 月 27 日就 13 起待决案件提交了信息。工作组认为上述信息不足以澄清案件。

重复案件

93. 工作组决定将 3 起案件视为重复案件。上述重复案件随即从工作组的记录中删除。

缅甸

政府提供的信息

94. 缅甸政府于 2019 年 1 月 3 日就 1 起待决案件提供了信息。工作组认为上述信息不足以澄清案件。

尼日利亚

根据信息源提供的信息作出澄清

95. 工作组根据信息源所提供的信息，决定澄清 Nwannekaenyi Kenny Namdi Okwu Kanu 的案件。当事人目前处于自由状态。

阿曼

信息源提供的信息

96. 信息源就 1 起待决案件提供了信息。工作组认为上述信息不足以澄清案件。

巴基斯坦

紧急行动

97. 审查所涉时期内，工作组在其紧急行动程序下向巴基斯坦政府送达了 6 起案件，事涉：

- (a) Azizullah, 据称于 2018 年 11 月 15 日在俾路支省苏拉布镇吉瓦村遭三军情报局成员绑架；
- (b) Abdul Shakoor, 据称于 2017 年 5 月 10 日在位于俾路支省胡兹达尔市巴扎里零点地区的扎希德·汗·苏马拉尼大理石厂遭三军情报局成员绑架；
- (c) Momin Khan Momin, 据称于 2019 年 1 月 31 日在位于卡拉奇市 Gulistan e Jauhar 社区的家中遭身着便衣的准军事部队成员和警察绑架；
- (d) Mohisn Khan, 据称于 2019 年 1 月 31 日在位于卡拉奇市 Gulistan e Jauhar 社区的家中遭身着便衣的准军事部队成员和警察绑架；
- (e) Shahid Nizam Nizam Uddin, 据称于 2019 年 1 月 31 日在位于卡拉奇市纳兹马巴德镇的家中遭身着便衣的准军事部队成员和警察绑架；
- (f) Amir Nizam Nizam Uddin, 据称于 2019 年 1 月 31 日在位于卡拉奇市纳兹马巴德镇的家中遭身着便衣的准军事部队成员和警察绑架。

标准程序

98. 工作组在其标准程序下向巴基斯坦政府送达了 64 起案件(见附件三)。

根据信息源提供的信息作出澄清

99. 工作组根据信息源所提供的信息，决定澄清事涉 Hassam 先生和 Muhammad Afzal 先生的 2 起案件。据报告，上述当事人已获释。

信息源提供的信息

100. 信息源就 3 起待决案件提供了最新信息。工作组认为上述信息不足以澄清案件。

政府提供的信息

101. 巴基斯坦政府于 2019 年 1 月 19 日就 1 起待决案件提交了信息。工作组认为上述信息不足以澄清案件。

适用六个月规则

102. 巴基斯坦政府于 2019 年 1 月 16 日和 19 日就 9 起待决案件提供了信息。工作组根据所提供的信息，决定对上述案件适用六个月规则。

澄清

103. 工作组根据巴基斯坦政府此前提供的信息，决定继六个月规则所规定的期限到期后澄清 91 起案件(A/HRC/WGEID/115/1，第 80 段)。

对联署指称函的答复

104. 2018 年 10 月 3 日，巴基斯坦政府针对 2018 年 7 月 16 日就包括英国—巴基斯坦记者 Gul Bukhari 在内的记者和媒体分支据称在巴基斯坦大选前遭恐吓问题发出的联署函(AL PAK 4.2018)¹¹ 提交了答复。巴基斯坦政府在其答复¹² 当中就为处理上述指称和保护该国的表达自由权而采取的措施提供了详细信息。

一般性指称

105. 工作组收到可信信息源提供的信息称，《宣言》在巴基斯坦的实施面临阻碍。于 2019 年 3 月 19 日向巴基斯坦政府送达了一般性指称(见附件一)。指称的重点主要是巴基斯坦普什图地区以及俾路支省安全部队实施的强迫失踪行为。

秘鲁

新闻稿

106. 于 2018 年 10 月 9 日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一道发布新闻稿，对秘鲁最高法院推翻对前总统阿尔韦托·藤森的赦免的裁定表示欢迎(见第 7 段)。

¹¹ 见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3957>。

¹² 见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File?gId=34350>。

俄罗斯联邦

标准案件

107. 工作组向俄罗斯政府送达了 40 起案件(见附件二)。

卢旺达

紧急行动

108. 工作组在其紧急行动程序下向卢旺达政府送达了 1 起案件，事涉 Boniface Twagirimana。当事人据称于 2018 年 10 月 7 日夜晚至 8 日在尼安扎市姆潘加监狱院内遭不明身份人员与几位监狱官员联手绑架。

沙特阿拉伯

紧急行动

109. 工作组在其紧急行动程序下向沙特政府送达了 4 起案件：

(a) 于 2018 年 9 月 26 日送达 1 起案件，事涉 Marwan Alaa Naji al-Muraisy。当事人据称于 2018 年 6 月 1 日在位于利雅得 Madinah al-Munawwarah 路 Sheikh bin Baz 路口的 Al-Badi'a 的家中遭身着便衣的国家安全部队逮捕；

(b) 于 2018 年 10 月 11 日送达 1 起案件，事涉贾迈勒·卡舒吉。最后一次有人见到当事人，是 2018 年 10 月 2 日看到他走进沙特阿拉伯驻伊斯坦布尔领馆；

(c) 于 2018 年 11 月 21 日送达 1 起案件，事涉 Abdulaziz Saeed Abdulla。据称最后一次有人见到当事人，是 2018 年 9 月在麦加的沙特国家安全检察院；

(d) 于 2018 年 11 月 20 日送达 1 起案件，事涉 Abdulrahman al-Sadhan。据称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是 2018 年 10 月 28 日在吉达的达班监狱。

110. 工作组按照其工作方法，向也门政府发送了 Marwan Alaa Naji al-Muraisy 案件的副本，向土耳其政府发送了 Jamal Khashoggi 案件的副本，并向卡塔尔政府发送了 Abdulaziz Saeed Abdulla 案件的副本。

标准程序

111. 工作组在其标准程序下向沙特政府送达了 1 起案件，事涉 Mohsen al-Korbi。据称当事人于 2018 年 1 月 29 日在也门和阿曼之间的沙恩过境点遭沙特领导的联军逮捕。

112. 工作组按照其工作方法，向卡塔尔、阿曼和也门政府发送了该案的副本。

适用六个月规则

113. 沙特政府于 2019 年 1 月 21 日就 1 起案件提供了信息(见第 109(c)段)。工作组根据所提供的信息，决定对该案适用六个月规则。

114. 沙特政府于 2018 年 9 月 9 日、9 月 18 日、10 月 29 日和 11 月 2 日以及 2019 年 1 月 21 日就 4 起待决案件提供了信息。工作组根据所提供的信息，决定对上述案件适用六个月规则。

根据信息源提供的信息作出澄清

115. 工作组根据信息源所提供的信息，决定澄清事涉 Samar Badawi、Amal al-Harbi、Nassima al-Sadah、Abdulmajeed al-Zahrani 和 Ahmed al-Zahrani 的案件。据报告，上述当事人目前在押。

联署紧急呼吁

116. 工作组于 2018 年 10 月 8 日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一道，就记者贾迈勒·卡舒吉据称遭强迫失踪且据称在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馆遭谋杀一事送达了一份紧急呼吁。¹³

对联署紧急呼吁的答复

117. 2018 年 10 月 23 日，沙特政府针对 2018 年 7 月 26 日就人权维护者 Khalid al-Omair 据称遭隔离拘押一事发出的联署函(SAU 9/2018)¹⁴ 提交了答复。沙特政府在答复¹⁵ 中对特别程序机制所作指控提出了异议，并就事件作出了自己的陈述。

新闻稿

118. 于 2018 年 10 月 9 日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一道发布新闻稿，要求立即针对沙特新闻记者兼批评政府人士贾迈勒·卡舒吉案件展开独立的国际调查(见第 8 段)。

意见

119. 工作组感到遗憾的是，未收到沙特政府就记者贾迈勒·卡舒吉遭强迫失踪及其在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馆遭谋杀一事提供的任何信息。工作组重申要求针对上述事件展开独立、公正的国际调查，确保查出责任人并将其绳之以法。

斯里兰卡

标准程序

120. 工作组向斯里兰卡政府送达了下列 6 起案件：

(a) Rajkumar Kathirvel，据称于 2008 年 9 月 6 日被一名军队成员要求送其前往 Chettikulam 军营后失踪；

¹³ 见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4134>。

¹⁴ 见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3967>。

¹⁵ 见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File?gId=34374>。

(b) Maanikkaraasa Kandasamy, 据称于 2010 年 4 月 24 日在瓦武尼亚市遭马纳尔警察逮捕;

(c) Pushpadevi Yoganathan, 据称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在贾夫纳区 Alvaai North 镇遭军队成员逮捕;

(d) Suboshan Amirthanathan, 据称于 2010 年 6 月 21 日在贾夫纳区 Thellippalai 镇遭驻扎在坎凯桑图赖的海军人员逮捕;

(e) Antony Arulthas Joseph Peter, 据称于 2010 年 6 月 21 日在斯里兰卡贾夫纳区 Thellippalai 镇遭驻扎在坎凯桑图赖的海军人员逮捕;

(f) Wickneshwaran Shanmuganathan, 据称于 2010 年 12 月 30 日在贾夫纳区 Savakachcheri 镇遭军队人员逮捕。

信息源提供的信息

121. 信息源就 4 起待决案件提供了最新信息。工作组认为上述信息不足以澄清案件。

苏丹

紧急行动

122. 工作组在其紧急行动程序下向苏丹政府送达了 1 起案件，事涉 Yasir Elsir Ali Sid Ahmed。据称当事人于 2019 年 1 月 5 日在其位于恩图曼的家中遭国家情报与安全局便衣逮捕。

政府提供的信息

123. 苏丹政府于 2019 年 1 月 24 日就 1 起待决案件提交了信息(见第 122 段)。

根据信息源提供的信息作出澄清

124. 工作组根据信息源所提供的信息，决定澄清事涉 Yasir Elsir Ali Sid Ahmed 的案件(见第 122 段)。据报告，当事人已获释。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标准程序

125. 工作组向叙利亚政府送达了 28 起案件(见附件三)。

126. 工作组按照其工作方法，向伊拉克政府发送了其中 2 起案件的副本。

根据信息源提供的信息作出澄清

127. 工作组根据信息源所提供的信息，决定澄清事涉 Qamar Jaafar 的案件。据报告，当事人目前在押。

信息源提供的信息

128. 信息源就 1 起待决案件提供了最新信息。工作组认为上述信息不足以澄清案件。

129. 工作组根据所提供的信息，决定重新启动 Ali al-Shihabi 的案件。

一般性指称

130. 工作组收到可信信息源提供的信息称，《宣言》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实施面临阻碍。于 2019 年 3 月 27 日向叙利亚政府送达了一般性指称(见附件一)。指称的重点主要是针对成千上万叙利亚人实施(主要由政府力量实施)的酷刑、法外杀戮和强迫失踪行为的现有相关证据。

意见

131. 工作组希望回顾《宣言》第 10 条第 1 和第 2 款。根据上述条款，应将任何被剥夺自由的人安置在官方认可的拘留地点，并遵照国家法律，在拘留后立即交由司法当局处理。应将他们遭到拘留一事以及他们的拘留地点，包括转移的准确情况立即通知其家属、律师或任何其他有合法理由关心这种情况的人，除非有关人员表示与此相反的愿望。

泰国

适用六个月规则

132. 泰国政府于 2019 年 1 月 15 日就 4 起待决案件提供了信息。工作组根据所提供的信息，决定对上述案件适用六个月规则。

政府提供的信息

133. 泰国政府于 2019 年 1 月 15 日就 2 起待决案件提交了信息。工作组根据所提供的信息决定暂停审议上述案件，直至下一届会议。

意见

134. 工作组感谢泰国政府努力与工作组接触，并希望泰国政府考虑同意工作组在 2019 年间对该国进行访问的要求。

土耳其

适用六个月规则

135. 土耳其政府于 2018 年 12 月 21 日就 2 起待决案件提供了信息。工作组根据所提供的信息，决定对上述案件适用六个月规则。

政府提供的信息

136. 土耳其政府于 2018 年 12 月 21 日就 30 起待决案件提交了信息。工作组认为上述信息不足以澄清案件。

根据信息源提供的信息作出澄清

137. 工作组根据信息源提供的信息，决定澄清事涉 Mustafa Özben 的案件。据报告，当事人现处于自由状态。

信息源提供的信息

138. 信息源就 3 起待决案件提供了最新信息。工作组认为上述信息不足以澄清案件。

意见

139. 工作组希望回顾工作组土耳其访问报告中就以诉讼时效已过期为由决定不予起诉的案件发表的所有意见(A/HRC/33/51/Add.1, 第 19-20 段)。《宣言》当中规定，当《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规定的补救办法不再有效时，在重新确定法律补救办法之前，应中止与被强迫失踪行为有关的诉讼时效限制(第 17 条第 2 款)。如果有任何与被强迫失踪行为有关的诉讼时效限制，这种限制应是实质性的并与罪行的极其严重性质相称(第 17 条第 3 款)，且应仅在当事人的命运或下落已经清楚的一刻起方能生效。无论如何，终止对据称发生的强迫失踪情事进行的刑事调查，并不免除国家搜寻和查找失踪人员或其遗骸的义务。

土库曼斯坦

信息源提供的信息

140. 信息源就 1 起待决案件提供了最新信息。工作组认为上述信息不足以澄清案件。

联署即时干预函

141. 工作组于 2018 年 11 月 27 日与另一项特别程序机制一道，就某人据称因在人权领域与联合国、其代表和机制合作(具体而言，与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合作)而遭报复一事发出即时干预函。¹⁶

意见

142. 工作组感到遗憾的是，未收到土库曼斯坦政府就 2018 年 10 月 5 日送达的有关据称土库曼斯坦监狱系统内有很多强迫失踪情况的一般性指称(A/HRC/WGEID/116/1, 第 172 段和附件一)提供的任何信息。

143. 工作组还提及 2016 年 11 月 18 日向土库曼斯坦政府发出的国别访问要求。工作组感到遗憾的是，尽管土库曼斯坦政府官员公开表示与工作组加强了合作，但工作组尚未收到积极的答复。工作组希望土库曼斯坦政府很快会对其要求作出积极的答复。

¹⁶ 见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4207>。

乌克兰

标准程序

144. 工作组在其标准程序下向乌克兰政府送达了 2 起案件，事涉：

- (a) Aleksandr Zagnitko, 据称于 2014 年 8 月 18 日在卢甘斯克的一栋私人住宅遭内务部设在 Oktyabrskiy 的办公室的代表绑架；
- (b) Dmitry Balagurov, 据称于 2014 年 11 月 30 日在顿涅茨克机场遭武装部队成员支持下的“右区党”第 5 营成员绑架。

停止审议

145. 工作组按照其工作方法第 28 段特别决定停止审议事涉 Sergey Vladimir V. Bezliudko、Aleksei Vladimirovic Bezliudko 和 Vadim Ivanovijch Vilchick 的 3 起待决案件。不过，上述案件可随时重新启动。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紧急行动

146. 工作组在其紧急行动程序下向阿联酋政府送达了下列 2 起案件：

- (a) 于 2018 年 10 月 5 日送达事涉 Abudujilili Supi 的案件。当事人据称于 2018 年 9 月 21 日下午 5 时左右在阿卜杜拉·本·拉瓦哈清真寺前遭国家安全部队成员逮捕；
- (b) 于 2019 年 1 月 3 日送达事涉 Rashid Hussain Brohi 的案件。当事人据称于 2018 年 12 月 27 日在其位于阿吉曼酋长国麦纳麦镇的住所遭便衣警察逮捕。

147. 工作组按照其工作方法向土耳其政府发送了 Supi 先生案件的副本，并向巴基斯坦政府发送了 Brohi 先生案件的副本。

标准程序

148. 工作组向阿联酋政府送达了 2 起案件，事涉：

- (a) Eliana Massiel Domingues Cid, 据称于 2017 年 4 月在迪拜遭逮捕并被带往不明地点的拘押中心；
- (b) 据称 Eliana Massiel Domingues Cid 在不明地点关押期间，于 2017 年 4 月 29 日诞下一名女婴。

149. 工作组按照其工作方法向多米尼加共和国政府发送了上述案件的副本。

政府提供的信息

150. 阿联酋政府于 2018 年 2 月 7 日就 1 起待决案件提交了信息(见第 146(a)段)。工作组认为上述信息不足以澄清案件。

适用六个月规则

151. 阿联酋政府于 2018 年 10 月 11 日就 1 起待决案件提供了信息。工作组根据所提供的信息决定对该案适用六个月规则。

联署指称函

152. 工作组于 2018 年 12 月 6 日与另一项特别程序机制一道，就 Sheikha Latifa al-Maktoum 继续遭强迫失踪一事送达了指称函。¹⁷

联署指称函

153. 工作组于 2019 年 1 月 17 日与另一项特别程序机制一道，就 Rashid Hussain Brohi 遭强迫失踪一事送达了指称函。¹⁸ 当事人系巴基斯坦国民，面临着被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驱逐回巴基斯坦的风险。他在巴基斯坦将面临生命危险。

意见

154. 工作组希望回顾《宣言》第 10 条第 1 和第 2 款。根据上述条款，应将任何被剥夺自由的人安置在官方认可的拘留地点，并遵照国家法律，在拘留后立即交由司法当局处理。应将他们遭到拘留一事以及他们的拘留地点、包括转移的准确情况立即通知其家属、律师或任何其他有合法理由关心这种情况的人，除非有关人员表示与此相反的愿望。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适用六个月规则

155. 2018 年 9 月 6 日，政府就 1 起待决案件提供了信息。工作组根据所提供的信息，决定对该案适用六个月规则。

一般性指称

156. 工作组从可信来源获得的信息称，《宣言》在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的实施面临阻碍。于 2019 年 3 月 27 日向该国政府送达了一般性指称(见附件一)，主要针对的是政治反对派与和平抗议者遭短期强迫失踪这一模式。

越南

紧急行动

157. 工作组在其紧急行动程序下向越南政府送达了 1 起有关 Ngo Van Dung 的案件。当事人据称于 2018 年 9 月 4 日遭警方拘押。

¹⁷ 见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4233>。

¹⁸ 见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4297>。

津巴布韦

政府提供的信息

158. 津巴布韦政府于 2018 年 11 月 28 日就 5 起待决案件提交了信息。工作组认为上述信息不足以澄清案件。

Annex I

General allegations

India

1. The Working Group received information from the source concerning alleged violations and obstacles encounter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eclara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All Persons from Enforced Disappearance (hereafter, the Declaration) in the Indian State of Jammu and Kashmir.

2. According to the sources, in Jammu and Kashmir the phenomenon of disappearances was one of the principal methods adopted by the State to suppress dissent, and therefore, students, political activists, human rights defenders, lawyers, members of armed groups and civilian populations were disappeared in significant numbers – frequently from custody of the State special agencies which operate in Jammu and Kashmir. It is reported that a conservative estimate, based on information collected from parents, relatives, friends and other sources, that the number of individuals who disappeared in custody since 1989 is as high as 8,000.

3. Sources allege that this phenomenon has been acknowledged by the State. Despite this acknowledgement, the Government has yet to show efforts towards the ratif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all Persons from Enforced Disappearance (hereafter, the Convention). On the contrary, certain actions of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contradict Convention intentions, although India signed the Convention in 2007 and thus accepted an obligation under international treaty law to not act contrary to its object and purpose. One recent example of such conflicting act, sources report, is the decision to revise the Public Safety Act, 1978 (hereafter, PSA). Reportedly, the Government has relied heavily on the PSA to enforce administrative detentions without trials and to detain individuals outside the State of Jammu and Kashmir, causing anguish for families who spend years searching for loved ones. Sources assert that revisions made to the PSA in 2018 strengthen the framework for these arrests and detentions. They are also contrary to the Declaration.

4. According to the sources, a related problem is that in contravention of both the Convention and the Declaration, Indian law does not contain an autonomous crime of enforced disappearance. Sources submit that this results in non-complianc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 to investigate, prosecute, and adequately punish any perpetrator of an enforced disappearance. Reportedly, when families lodge “missing persons” complaints against officers of Special Forces – military, paramilitary and State security, Indian law requires permission of the Government before they can be prosecuted. One example of such a law is the Armed Forces (Jammu and Kashmir) Special Powers Act, 1990 (AFSPA), which classifies the State of Jammu and Kashmir as a “disturbed” area, and grants broad powers and immunity to security forces including the requirement to get prior permission or sanction from the federal government before a member of the armed forces can be prosecuted in a civilian court. While Jammu and Kashmir is administered under a different set of laws due to its special constitutional status, the Armed Forces (Special Powers) Act 1958, with identical terms, is applied to other areas of the country.

5. Secondly, sources assert that the absence of a crime of an enforced disappearance in Indian legislation obstructs the right to truth – a right which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afeguarding. The existing “right to information” frameworks in India (Right to Information Act, 2005) and in Jammu and Kashmir (Jammu and Kashmir Right to Information Act, 2009) provide for the right to obtai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including information about past disappearances. However, these frameworks are fraught with limitations which, sources assert, make it easy to deny families information about progress or results of investigations involving officers of special State services. Additionally, reports relay that where families have approached the High Court of Jammu and Kashmir with writs of habeas corpus to determine the whereabouts of disappeared persons, most of these petitions have been dismissed. In cases where the judge rules in

favour of an applicant, the Executive fails to comply with the order, according to the sources.

6. Sources report that other challenges faced by disappeared victims and their families include the lack redress and adequate compensation, including rehabilitation. Reportedly, the law in Jammu and Kashmir does not provide for compensation specifically for victims of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Rather, an ex-gratia payment is available for families who can present evidence that a disappeared individual has been presumed dead for seven years and can prove that neither (s)he nor a family member was ever associated with militant activities. The local District Screening Committee then screens cases of "missing persons" for ex-gratia relief, decides which persons can be presumed dead, and issues a death certificate. According to the sources, the process burdens families with a need to produce several documents for consideration. The screening process is also prone to political influence as families must provide influential recommendation letters. Finally, sources assert,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may also be the perpetrators of an enforced disappearance. In the end, the relief amount of 1 lakh rupees is quite small, though it remains the same since 1990.

7. Similarly, the scheme of compassionate employment in Jammu and Kashmir is only available on the presumption of death, and the screening process may be influenced by potentially complicit authorities, according to the sources. Since applications for compassionate appointment are not considered after one year of a presumed death of the disappeared individual, this rule contradict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enforced disappearance being of a continuous nature.

8. Other issues which highlight the need for a law on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in India include, according to the sources, social status of wives and children of forcibly disappeared, economic burden on families of the disappeared, mental health of victims and their families, as well as legal regulations related to marriages and inheritance.

Pakistan

9. The Working Group received information from sources concerning reported obstacles encounter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clara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All Persons from Enforced Disappearance in Pakistan.

10. The Working Group received a report that thousands of persons, including children and women, have been forcibly disappeared by security forces in Pashtun areas of Pakistan. They also report that most of the women, who have tried to register the cases of their loved ones with a human rights council commission established by the government of Pakistan, have experienced some form of harassment when doing so. The sources further report that the courts, police, media, and other human right organizations are not operating in Pashtun areas.

11. The Working Group also received a report that approximately 2,000 enforced or involuntary disappearances were documented in Balochistan in 2017. According to sources, people from various backgrounds were abducted in military raids and operations. The sources report that Frontier Corps, that report to the Ministry of Interior, or military and secret service agents of intelligence agencies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of activists and civilians in Balochistan. They report that, in some cases, death squads kidnap people for ransom.

12. The Working Group was also informed that newly discovered mass graves are not properly investigated in Balochistan. According to a source, a new mass grave was discovered in the Panjgur district of Balochistan on July 17, 2018. The source reports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neither acknowledged its existence nor examined the bodies to ascertain their identity. In 2014, three mass graves were found by a shepherd in Tutak area of Khuzdar, containing more than 150 bodies, including a that of a resident who had been picked up by Frontier Corps. Another mass grave was found in the Panjgur area of Balochistan in 2011, which contained three bodies previously abducted by the Frontier Corps. According to sources, all the four bodies from the recently discovered gravesite

were decomposed beyond recognition. The sources request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nduct a DNA test of the bodies to establish their identity, and that an impartial investigation should be conducted to bring the perpetrators to justice.

Syrian Arab Republic

13. The Working Group received information from credible sources alleging obstacles encountered to implement the Declara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All Persons from Enforced Disappearance in the Syrian Arab Republic.

14. It was reported that there is available evidence on torture, extrajudicial killings and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According to the sources, it is estimated that tens of thousands of Syrians have been disappeared by pro-Government forces, primarily Syrian Government forces. Indeed, such sources reportedly documented a systematic pattern in which men above the age of 15 years had been arbitrarily arrested and detained by Government security, armed forces, or militia acting on their behalf during mass arrests, at checkpoints, or during house searches. Since then, their whereabouts remain unknown, which would show a pattern of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in the Syrian Arab Republic.

15. It was reported that, after being taken to places of detention run by Syrian intelligence or military agencies, detainees were often severely beaten, and many of whom perished due to torture, inhuman living conditions, lack of adequate medical assistance, or wilful neglect.

16. Moreover, the sources indicated that victim's relatives seeking for the truth are facing obstacles. Families were allegedly compelled to pay bribes to learn the whereabouts of their detained relatives, or on other occasions, they were never informed of their whereabouts and never saw them again.

17. Many of these families learned the fate of their relatives for the first time in May 2018, when State entities provided Government civil registry offices, which registered their deaths and subsequently updated family records. According to the sources, many individuals whose statuses were updated to reflect their deaths are believed to have been detained by State authorities between 2011 and 2014.

18. The sources also reported that these notifications have been issued by military hospitals, such as Tishreen military hospital and Mujtahid hospital, and appeared to be signed by one or more officials. They recorded, in nearly every instance, natural causes of death such as "heart attack". In other cases, the deceased were reportedly executed as a result of a decision by either the First or Second Field Court (including reportedly at Sednaya Prison). According to the sources, the fact that some individuals from the same geographic area share common death dates possibly indicates group executions.

19. The sources pointed out that, by updating the records of those disappeared, State officials including high-ranking members of the Military Police corps of the Syrian Arab Army admit to having information about the fates of those deceased. According to the sources, to that end, the State is further tacitly admitting to knowing where the individuals were at the time of their deaths, as well as to having played a role in deaths in the cases of executions by court order or extrajudicial executions.

20. According to the sources, the State, however, has not released any information on the whereabouts of bodies, nor provided any restitution of personal belongings. Thus, the enforced disappearance, as a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continues as long as families do not know the victim's whereabouts.

Venezuela (Bolivarian Republic of)

21. El Grupo de Trabajo recibió información de fuentes fidedignas sobre obstáculos encontrados en la aplicación de la Declaración sobre la Protección de Todas las Personas contra las Desapariciones Forzadas en la República Bolivariana de Venezuela.

22. La presente alegación general se enfoca principalmente en la alegada repetición de desapariciones forzadas de corta duración de las que serían víctimas opositores políticos.

23. De acuerdo con información recibida, desde el año 2014 se ha identificado una evolución en los patrones de desaparición, principalmente en el contexto de detenciones arbitrarias de personas que participan en manifestaciones públicas o que emiten opiniones críticas al gobierno.

24. Entre el mes de febrero y los primeros días del mes de marzo del año 2014, en los casos documentados se identificó a personas que tras su detención eran incomunicadas durante horas o hasta ser presentadas en los tribunales penales. Hasta este momento, se les catalogaba como “no localizados” y solo después de las 48 horas o más, si no eran presentados a tribunales, pasaban a la categoría de “desaparecido”, toda vez que al dirigirse a los centros de detención, en muchos casos no oficiales, los abogados y familiares no podían verificar el paradero de las personas detenidas debido a la negativa de los funcionarios de seguridad a cooperar y ofrecer información.

25. Adicionalmente se comenzó a observar que los organismos de seguridad, al detener a las personas, pasaban a “ruletearlas” durante horas y por varios centros de detención, sin que los abogados pudieran tener certeza del paradero de las mismas. En varios casos, transcurrían muchas horas hasta que los familiares de las personas detenidas conocieran su ubicación, por lo general a través de vías informales.

26. Las fuentes alertaron en 2014 sobre algunas denuncias de desapariciones que cesaban después de varias horas, situaciones que facilitaron otras violaciones como la práctica de tortura y malos tratos, y que esta conducta se ha vuelto recurrente desde mediados de 2016, siendo más reiterada a partir de 2017. La Oficina del Alto Comisionado de las Naciones Unidas para los Derechos Humanos (OACNUDH), precisó que durante la serie de manifestaciones ocurridas entre abril y agosto de 2017 algunas detenciones en régimen de incomunicación se convirtieron en desapariciones forzadas de corta duración, ya que las autoridades se negaban a informar a los familiares y abogados sobre el paradero de sus familiares detenidos. Asimismo, la OACNUDH documentó más de media docena de casos de personas arrestadas por miembros de las fuerzas de seguridad o de los servicios de inteligencia que fueron llevadas a centros de detención no oficiales donde fueron retenidos por hasta una semana antes de que fueran liberadas sin ser presentadas ante un juez.

27. Asimismo, una de las fuentes ha denunciado el aumento de número de casos de desapariciones forzadas en Venezuela desde el año 2013. En 2015 se contabilizaron 3 casos y en el año 2016, 19 casos. La fuente denuncia que desde 2000 hasta 2016 se documentaron 188 desapariciones forzadas en el país, las cuales casi en su totalidad se encuentran impunes.

28. En el caso de la ejecución de los operativos policiales denominados “Operación de Liberación del Pueblo” (OLP), también fueron documentados casos de ejecuciones sin que aparecieran los cuerpos, o casos de personas que fueron detenidas en dichas operaciones y cuyo paradero se desconoce. De igual forma, la Comisión Interamericana de Derechos Humanos en el informe de país presentado en febrero de 2017 dedica una sección a las OLP y denuncia la desaparición de personas que presuntamente habían sido detenidas y torturadas en el marco de estos operativos.

29. Las fuentes se refieren a la aparición de un patrón de desapariciones forzadas por motivos políticos realizadas con varios días de incomunicación absoluta, y expresan su preocupación y temor de que esta violación de derechos humanos se incorpore “naturalmente” al repertorio de formas ilegales de actuación de los cuerpos de seguridad.

30. Entre los casos documentados por las fuentes se aprecian los siguientes patrones:

A. Desapariciones forzadas de corta duración

Se trata de casos en los que las personas fueron arbitrariamente detenidas y su paradero fue negado por los organismos de seguridad que practicaron la detención, incluso a pesar de la presencia de abogados y familiares en los sitios de reclusión, quienes se encontraban presentes para constatar la ubicación de los detenidos. Las personas encarceladas eran

posteriormente reconocidas como detenidas y/o dejadas en libertad sin cargos, tras varias horas o días sin información ni certeza de su ubicación.

B. Desapariciones forzadas ocurridas durante traslados posteriores a la detención inicial

Se documentaron casos en los que, además de haberse producido una negación inicial de la detención, los afectados fueron objeto de traslados en circunstancias en las que nuevamente las autoridades no brindaron información sobre el paradero de los mismos. Se trata de situaciones particularmente delicadas, tomando en cuenta que, desde la dictadura de Pérez Jiménez y hasta los años 90, en condiciones similares se aplicó la llamada “ley de fuga”, una práctica que consiste en la ejecución extrajudicial de un detenido tras simular una evasión, generalmente en el marco de un traslado.

C. Desapariciones forzadas de larga duración

Se trata de hechos que tuvieron lugar hace varios años y sobre los cuales no se ha obtenido una respuesta en cuanto a la suerte o paradero de las víctimas, pese a existir testigos sobre la actuación de funcionarios públicos en el proceso de detención.

31. La información presentada por las fuentes permite identificar patrones en la actuación de los organismos de seguridad del Estado al momento de practicar detenciones, en las cuales se niega el paradero de la persona durante horas, días o incluso semanas; y se impide la comunicación con abogados y familiares lo que hace imposible constatar la ubicación, el estado y las condiciones de las personas detenidas, lo que situaría a las personas fuera de la protección de la ley.

32. De acuerdo con la fuente, las desapariciones forzadas suelen ser utilizadas como política de Estado para infundir terror en la ciudadanía, además de generar inseguridad para la sociedad en general.

Annex II

Urgent actions

Egypt

1. The Working Group, following its urgent action procedure, transmitted 34 cases to the Government concerning:
 - (a) Ezzat Eid Taha Fadel Khudair Ghoneim, allegedly last seen in Al-Haram Police Station on 13 September 2018;
 - (b) Mr. Magdy Sayed Hassan Ibrahim Ez Eldin, allegedly arrested from El Khanka, Qalyubia Governorate, Egypt, on 7 August 2018 by National Security Agents and other Security Forces;
 - (c) Mr. Hassan El-Badry Mahmoud Ali, allegedly last seen in the first week of October 2018 at the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in Asyut, Egypt;
 - (d) Mr. Mahmoud Abdel Raouf Mohamed Mohamed, allegedly arrested from New Beni Suef City, Egypt, on 18 September 2018 by National Security Agents;
 - (e) Mr. Mohamed Awad Baasiouny Al Assaly, allegedly arrested from a checkpoint in Haram city, Cairo Governorate, Egypt, on 10 September 2018 by the Police Force;
 - (f) Mr. Aly Mahmoud Aly Mahmoud Kedwany, allegedly arrested from El Raml Station district on 28 October 2018, by members of the Police Force;
 - (g) Mr. Tarek Mahmoud Hussein Mahmoud, allegedly arrested from Alexandria electricity distribution, Alexandria, on 23 October 2018, by members of the Police Forces;
 - (h) Waleed Ali Selim Mohammed Hamada, allegedly last seen on 30 October 2018, in Alexandria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Egypt;
 - (i) Ms. Nada Adel Mohammed Mohammed Morsy, allegedly arrested from El Qoreen Center, El Sharkeya Governorate, Egypt, on 12 October 2018, by members of the Police Force;
 - (j) Mrs. Abeer Naged Abdallah Mostafa, allegedly arrested from Abo Yousef District, Alexandria Governorate, Egypt, on 25 September 2018 by members of the Poli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Forces;
 - (k) Ms. Aya-Allah Ashraf Mohamed El-Sayed, allegedly arrested from Qalyubiya Governorate, Egypt, on 4 October 2018, by members of the Poli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Forces;
 - (l) Mrs. Hoda Abdelmonem Abdel Aziz Hassan, allegedly arrested from Nasser City, Cairo, Egypt, on 1 November 2018 by members of the Poli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Forces;
 - (m) Mr. Mohamed Abu Horira Mohamed Abdul Rahman, allegedly arrested from Al Yasmeen District, New Cairo, Egypt, on 31 October 2018 by members of the State Security Forces;
 - (n) Aisha Mohamed Khairat Saad Al Shater, allegedly arrested from Al Yasmeen District, New Cairo, Egypt, on 31 October 2018 by members of the State Security Forces;
 - (o) Sahar Salah Eldeen Ahmed Talaat Hathout, allegedly arrested from Old Egypt District, Cairo, Egypt, on 1 November 2018 by members of the State Security Forces;
 - (p) Somaia Mohamed Nassef Roshdy, allegedly disappeared on 31 October 2018, shortly before her places of residence were stormed by members of the Security Forces;

- (q) Ibrahim El Sayed Mohamed Abdo Ata, last heard from on 31 October 2018 shortly before his place of residence was stormed by Riot Police;
- (r) Mr. Osama Mabrouk Mousa Mohamed arrested from El Qolengil village, ElMansoura City, Dakahlia governorate, Egypt on 1 November 2018 by State Security Agents and members of the Armed Forces;
- (s) Marwa Ahmed Madboly Ahmed arrested from Shoubra Masr district, Cairo governorate, Egypt on 31 October 2018 by State Security Agents;
- (t) Ahmed Sayed Ahmed,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Cairo International Airport on 23 December 2018, by members of Airport Security;
- (u) Raia Aly,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Cairo International Airport on 23 December 2018, by members of Airport Security;
- (v) Yosr Mahmud,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Cairo International Airport on 23 December 2018, by members of Airport Security;
- (w) Jamal Abdelwahab Awad Allam allegedly arrested from Jawad High School on 19 December 2018, by members of the Security Forces;
- (x) Ahmed Adel Abdo El Zraa, allegedly disappeared from Rasheed Police Station on 14 October 2018;
- (y) Moatasem ballah Adel Abdo El Zraa allegedly disappeared from Rasheed Police Station on 14 October 2018;
- (z) Mahmoud Ahmed Mohamed Abdel Monem last seen in custody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on 10 October 2018;
- (aa) Mohamed Abo Bakr Saad Sherif, last seen in State Security Agency premises in Abes, Egypt on 29 November 2018;
- (bb) Mohamed Ezzeddin Youssef Malek disappeared from Cairo Airport on 23 December 2018, having previously been threatened by Security Service;
- (cc) Mohamed Ahmed Abdelhamid Antar disappeared from 10th of Ramadan City Police Station on 2 December 2018;
- (dd) El Sayed Qasem Saleh Ali El Gezawy disappeared from 10th of Ramadan City Police Station on 2 December 2018;
- (ee) Eslam Atya Ali Atya Sarhan disappeared from 10th of Ramadan City Police Station on 2 December 2018;
- (ff) Ahmed Kamal Ragab Soliman Frag disappeared from 10th of Ramadan City Police Station on 2 December 2018;
- (gg) Salah Hussin Mohamed Ali Ghoneim disappeared from 10th of Ramadan City Police Station on 2 December 2018;
- (hh) Moaaz Ahmed Mohamed El Farmawy disappeared from 10th of Ramadan City Police Station on 2 December 2018.

Annex III

Standard procedure cases

Russian Federation

1. The Working Group transmitted 40 cases to the Government, concerning:
 - (a) Ismail Idrisovich Taisumov, allegedly abducted in his house in the village of Novye Atagi, Chechen Republic, on 5 November 2001, b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 (b) Alvi Lechievich Khaiderkhanov, allegedly abducted in the city of Argun, Chechen Republic, on 9 June 2001, b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 (c) Ziyavdi Khamzatovich Khabilyaev,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his house in Grozny, Chechen Republic, on 3 October 2000, b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 (d) Mairbek Umarkhadzhievich Umarkhadzhiev, allegedly abducted on 13 November 2001, b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from his house in Grozny, Chechen Republic;
 - (e) Aslambek Mikailovich Umaev, allegedly abducted on 2 November 1999, b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t a checkpoint exiting Komsomolskoye village, Chechen Republic;
 - (f) Lechi Oмарovich Temirkhanov, allegedly abducted on 21 May 2002, b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 his house located in Mesker-Yurt village, Chechen Republic;
 - (g) Isa Lechievich Tegaev, allegedly abducted on 29 January 1995, b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round the city hospital number 9 located in Grozny, Chechen Republic;
 - (h) Rizvan Shamsudinovich Tatariev, allegedly abducted on 22 December 2001, b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 his house located in Gekhi village, Urus-Martan rayon, Chechen Republic;
 - (i) Adam Idrisovich Taisumov, allegedly abducted on 27 September 2004, b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 his house located in Novye Atagi village, Shalinskiy rayon, Chechen Republic;
 - (j) Akhulddin Saidal-Alievich Sultanov, allegedly abducted on 23 January 2003, b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military commandment and Vedenskiy district's Ministry of Interior (MoI) office in Kharachoy village, Shalinskiy rayon, Chechen Republic;
 - (k) Seifudi Saipulaevich Seifulaev, allegedly abducted on 16 December 1999, b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 his house located in Pervomaiskaya station, Groznenskiy rayon, Chechen Republic;
 - (l) Said-Abdul Magomedovich Sangariev, allegedly abducted in the first days of December 1999, b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 Grozny, Chechen Republic;
 - (m) Aslanbek Abdul-Khalimovich Saltuev, allegedly abducted on 14 October 2002, b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 his house located in Urus-Martan, Chechen Republic;

(n) Lema Gaitukaev, on 17 October 1999, allegedly abducted b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t the Chervlennaya bridge over Terek river, on the highway between Tolstoy-Yurt and Chervlennaya villages, Chechen Republic;

(o) Oleg Karpov, allegedly abducted on 30 August 2014, b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 the area of Starobesheve settlement, Illovaisk region, Donetsk oblast;

(p) Viskha Abu-Khamidovich Pikaev, allegedly abducted on 26 March 2003, b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 the centre of the village of Chiri-Yurt, Shali district, Chechen Republic,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q) Anzor Abubakarovich Islamov, allegedly abducted on 5 June 2002, b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 his house in the city of Shali, Shali district, Chechen Republic;

(r) Saikhan Said-Mukhamedovich Isaev, allegedly abducted on 18 January 2005, b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 his house in the village of Chechen-Aoul, Grozny district, Chechen Republic;

(s) Akhamdi Ismailovich Isaev, allegedly abducted on 9 December 2001, b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 a house of the village of Valerik, Achkhoy-Martan district, Chechen Republic,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 Nurdin Khozh-Akhmedovich Isaev, allegedly abducted on 3 February 2000, b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 his house in the village of Valerik, Achkhoy-Martan district, Chechen Republic,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u) Magomed-Ali Shakhidovich Ilyasov, allegedly abducted on 12 November 2002, b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 his house of the village of Katar-Yurt, Achkhoy-Martan district, Chechen Republic,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v) Magomed-Salekh Shakhidovich Ilyasov, allegedly abducted on 12 November 2002, b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 his house of the village of Katar-Yurt, Achkhoy-Martan district, Chechen Republic,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w) Vakhita Musaevich Ishaev, allegedly abducted on 31 July 2002, b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close to the sugar factory of Argun, Chechen Republic, on his way back to home, accompanied by persons associated with him;

(x) Khampasha Supyanovich Ireziev, allegedly abducted on 20 November 2002, b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 the house of persons associated with him in the city of Grozny, Chechen Republic;

(y) Arbi Saikhanovich Chukaev, allegedly abducted on 7 March 2001, b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 his house in the village of Geldegan, Kurchaloevskiy district, Chechen Republic;

(z) Ms. Tamara Dzhabrailovna Khunarikova, allegedly abducted on 7 March 2001, b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 the village of Vedeno, Vedenskiy Rayon, Chechen Republic;

(aa) Ramzan Imranovich Khataev, allegedly abducted on 30 August 2002, b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 the city of Grozny, Chechen Republic;

(bb) Masud Rukmanovich Khakimov, allegedly abducted on 24 April 2001, b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 the boarding school ‘Red Cross’, village of Novye Atagi, Shalinskiy Rayon, Chechen Republic;

(cc) Muslim Usmanovich Khadisov, allegedly abducted on 3 December 2001, b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 his house in Achkhoy-Martan, Chechen Republic;

(dd) Islam Aslambekovich Utsaev allegedly abducted on 2 June 2002, b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 his house in Novye Atagi village, Chechen Republic;

(ee) Ruslan Sultanovich Ustarkhanov, allegedly abducted on 13 October 2002, b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 his house in Achkhoy-Martan, Chechen Republic;

(ff) Balaudi Shamilevich Ustarkhanov, allegedly abducted on 6 January 2003, b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 his house in Achkhoy-Martan, Chechen Republic;

(gg) Sulambek Tupaevich Usamov, allegedly abducted on 3 May 2003, b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 his house in station Kalinovskaya, Naurskiy rayon, Chechen Republic;

(hh) Aslambek Mikailovich Umaev, allegedly abducted on 2 November 1999, b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t a checkpoint exiting Komsomolskoye village, Chechen Republic, Russian Federation;

(ii) Tamerlan Abdulaevich Tovsultanov, allegedly abducted on 20 September 2002, b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 the centre of Achkhoy-Martan village, Chechen Republic;

(jj) Aslan Abdulaevich Tovsultanov, allegedly abducted on 20 September 2002, b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 the centre of Achkhoy-Martan village, Chechen Republic;

(kk) Aslan Sultanovich Timaev, allegedly abducted on 17 January 2004, b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 Chiri-Yurt village, Chechen Republic;

(ll) Ruslan Movlaevich Taismukhanov, allegedly abducted on 30 December 2002, b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t a checkpoint located in Starye-Atagi village, Shalinskiy rayon, Chechen Republic;

(mm) Kiuri Gaitukaev, allegedly abducted on 17 October 1999, b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t the Chervlennaya Bridge over Terek River, on the highway between Tolstoy-Yurt and Chervlennaya villages, Chechen Republic;

(nn) Salambek Magomedovich Tataev, allegedly abducted on 15 March 2001, b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 Duba-Yurt village, Shalinskiy rayon, Chechen Republic.

Pakistan

2. The Working Group transmitted 64 cases to the Government, concerning:

(a) Muhammad Arif Khuda Nizar, allegedly abducted during a raid in his house in the village of Harro, Kharan, Balochistan, on 4 August 2014, by members of Frontier Corps and the Inter-Service Intelligence;

(b) Muhammad Munir allegedly arrested from his home in Tehsil and District Bahawlpur, on 15 September 2012, by members of a secret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 Saqib Ali Khan allegedly arrested from the gate of Mosque Quba, in Tehsil and District Abbottabad, on 20 May 2013, by members of a secret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d) Muhammad Ali allegedly arrested from his home in Tehsil & District Kohat, on 12 January 2010, by members of a secret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e) Abdulk Majid allegedly abducted near a police station in Chiniot, in arrested from Tehsil & District Bhakkar, on 22 August 2013, by members of a secret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f) Umar Javed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G-8/1, Islamabad, on 28 March 2013, by members of a secret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g) Abdul Tawab believed to have been abducted on his way to work in Islamabad, on 2 September 2013, by members of a secret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h) Ehsaan Ullah allegedly abducted while travelling by bus from Peshawar to Kohat, at a checkpost in Kohat Tunnel, on 21 September 2011, by members of a secret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i) Nadeem Ahmad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Street No. 30, Sector F-8/1, Islamabad, on 6 September 2013, by members of a secret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j) Asad Ullah Vito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Model Town, Q Block Flat, in Okara, on 4 September 2013, by members of a secret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k) Muhammad Adnan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Ayub Park, Okara, on 15 October 2013, by members of a secret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l) Waseem Behri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Raheem Abad, Swat, on 30 July 2009, by members of a secret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m) Akbar Khan, allegedly arrested from his home in Musa Khel, District Mohmand Agency, on 7 April 2011, by members of a secret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n) Bahadur Zaid allegedly arrested from his home in Bagh Medani, District Lower Dir, on 4 March 2010, by members of a secret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o) Muhammad Bilal,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the market in the Faqeer Colony in Karachi, on 20 September 2011, by members of a secret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p) Aziz Khan,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the Mohri Sharif Kharian village, 10 June 2010, by members of a secret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q) Gul Muhammad,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his home in District Swat, on 10 June 2010, by members of a secret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r) Bakht Zaree,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his home in District Swat, on 14 January 2009, by members of a secret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s) Muhammad Ayyaz,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his home in District Swat, 1 July 2009, by members of a secret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t) Muhammad Ali,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his home in Sector G-10/3, Islamabad, on 6 July 2007, by members of a secret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u) Arsalan Masood Khan,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his home in Surjani Town, Karachi, on 11 December 2010, by members of a secret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v) Arshaf Iqbal,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his home in Tehsil & District Swat, on 5 September 2009, by members of a secret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w) Shakeel Arshad,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his home in Green Town, Lahore, on 8 February 2011, by members of a secret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x) Muhammad Zakria,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his home in Tehsil Matta, District Swat, on 8 September 2012, by members of a secret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y) Muhammad Shafiq,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his home in Bara District, Khyber Agency, on 25 February 2010, by members of a secret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z) Abdul Aziz,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Nawab Market, Hayatabad, Peshawar, on 25 January 2013, by members of a secret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aa) Muhammad Wali Khan,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Charsadda Road, near the Faqirabad Police Station, Peshawar, on 24 December 2011, by members of a secret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bb) Sher Ali, Shamozai Chongi,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his home in Tehsil & District Swat, on 28 January 2010, by members of a secret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cc) Gul Zaman, allegedly abducted during an army raid, from Thana Hashtnagri, Dilzaak Road, Peshawar, on 10 April 2010, by officials of the Pakistan Army and members of a secret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dd) Khuda Yaar,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Jamia Tauheed Masjid, located in Johar Town, Lahore, on 29 July 2012, by members of a secret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ee) Hazrat Usman, allegedly abducted on his way home from work in Air Town, Mango Pir Road, Karachi, on 20 June 2010, by officials of the Pakistan Army and members of a secret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ff) Hafiz Muhammad Sajjad,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a house in Gulgash Colony, Gulshan Wadi, Lahore, on 7 February 2013, by members of a secret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gg) Gul Zaman,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Dargai Kalay, on 26 June 2011, by members of a secret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hh) Muhammad Khizar Jamal, was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his home in Nazimabad, Karachi, on 11 December 2010, by members of a secret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ii) Muhammad Ishaq,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the District Courts (District Kachehri), in Peshawar, on 24 November 2009, by members of a secret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jj) Sultan Akbar, born on 15 April 1981,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his home in Tehsil & District Mardan, on 17 April 2012, by members of a secret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kk) Muhammad Iqbal,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his home in Tehsil & District Swat, on 13 August 2009, by members of a secret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ll) Haider Ali,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his home in Tehsil & District Swat, on 5 September 2009, by members of a secret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mm) Zakir Shah,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his home in Tehsil Tangi, District Charsadda, on 4 May 2010, by members of a secret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nn) Khawar Mehmood,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Nawab Colony, District Bahawalnagar, on 29 November 2012, by members of a secret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oo) Aslam Khan,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his home in Bara Bandai Tehsil, District Swat, on 8 June 2009, by members of a secret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pp) Khaista Bacha,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his home in Bara Bandai Tehsil, District Swat, on 10 June 2009, by members of a secret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qq) Sardar Ahmad,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his home in Swat, Kabal, on 25 August 2009, by members of the Pakistan army;

(rr) Zia ur Rehman,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his home in Tehsil Kabal, District Swat, on 8 June 2009, by members of a secret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ss) Noor Zada Zada,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his home in Dera Ismail Khan, on 9 April 2009, by members of a secret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tt) Shah Zada Zada,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his home in Dera Ismail Khan, on 9 April 2009, by members of a secret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uu) Khan Zada,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his home in District Swat, on 3 September 2009, by members of a secret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vv) Abdul Rasheed,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his home in Tehsil Kabal, District Swat, on 3 September 2009, by members of a secret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ww) Muhammad Shoaib, allegedly abducted after leaving his home to drive his rickshaw, in Karachi, on 15 November 2012, by members of a secret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xx) Syed Qasim Ali Shah,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the Railway crossing on Bannu Road, Kohat Cantt, on 13 September 2009, by members of a secret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yy) Raheem Ullah, allegedly last known to be in the custody of the Sindh Police, in the winter of 2009;

(zz) Zafar Hussain,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a bus while traveling to the Dalbardeen Unit of the Frontier Corps Battle School in Quetta, on 1 May 2013, by members of a secret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aaa) Raheem Ullah,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Rehmaniya Masjid Mozah Banday, Tehsil Kabal, on 15 October 2009, by members of the Pakistan Army during the search operation in Swat;

(bbb) Hazrat Ali,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Kanju Chowk Checkpost, in Swat, on 26 August 2008, by members of the Pakistan Army;

(ccc) Ehsan Ullah, allegedly abducted during a raid on the Shinwari Hotel, Katlang Mardan Road, on 22 December 2012, by four members of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ddd) Inayat Ullah, allegedly abducted while travelling in a passenger van from Isplanji, District Mustang to Quetta, Balochistan, on 25 May 2014, by members of the Frontier Corps and plain clothed personnel belonging to the military, police and intelligence agencies;

(eee) Mehar Gul Marri,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his home in Mill Colony, Quetta, Balochistan, on 14 September 2015, by members of the Frontier Corps, police and army personnel;

(fff) Nasir Ahmed,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his home in Sufara Ghoat, Karachi, on 15 October 2017, by members of the Frontier Corps and the Army;

(ggg) Rafiq,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a home in Sufara Ghoat, Karachi, on 15 October 2017, by members of the Frontier Corps and army personnel;

(hhh) Saqib Ali, allegedly abducted while at a picnic at Khuzdar, Balochistan, on 2 October 2017, by members of the Frontier Corps and army personnel;

(iii) Irfan Ali,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his home in Quetta, Balochistan, on 25 July 2015, by members of the Frontier Corps, state intelligence agencies, and the police;

(jjj) Mudasir Baloch,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his home in Killi Jamaldani, Noshki on 24 November 2014, by members of the Frontier Corps, State intelligence agency personnel, and the police;

(kkk) Qadir Bakhsh,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a clothing shop at Saryab Road, Quetta, Balochistan, on 24 February 2018, by members of the Frontier Corps and the police;

(lll) Mushtaq Ahmed,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a football ground in Killi Mussa Khan, Kardgap Tehsil, Mustang District, Balochistan, on 4 December 2016, by members of the Security Forces and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agency.

Syrian Arab Republic

3. The Working Group transmitted 48 cases to the Government concerning:

(a) Abdel Kafi Arnaout allegedly arrested from Al Hajj Atef Square, Homs, Syria on 4 February 2013 by members of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 (b) Abdel Moein Al Arnaout allegedly arrested from Al Hajj Atef Square, Homs, Syria on 4 March 2013, by members of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 (c) Ali Al-Sankari allegedly arrested from near the School of Agriculture, Hama, Syria, on 26 June 2013 by Air Force Intelligence;
- (d) Tarek Al-Sankari allegedly arrested from Salamiyah, Governorate of Hama, Syria on 26 June 2013, by Air Force Intelligence;
- (e) Monthir Al Najm, allegedly arrested from a checkpoint in Al Saboniyyeh neighbourhood on 9 March 2013 by the Military Security Forces of the Government;
- (f) Mohamed Bakkor Al Jabran allegedly arrested from a checkpoint of Al Mazzah highway road in Damascus on 24 August 2013 by Military Security Forces;
- (g) Zakaria Jabara allegedly arrested from Al Hamam Street on 2 February 2013 by members of the Military Security;
- (h) Wael Mansour allegedly arrested from at a checkpoint in the industrial area of Damascus on 2 April 2013 by members of the Military Security;
- (i) Abd al-Aziz al-Hisni, allegedly arrested from Joorat as-Shayah neighbourhood, Homs, Syria on 25 May 2012, by the Army of the Syrian Government;
- (j) Basel Tabbakh, allegedly arrested from Karamila Circle, Jaramana on 12 March 2013, by pro-Government militia currently known as the National Defence Forces;
- (k) Mohammad Arab allegedly arrested from Al Sheikh Khuder neighborhood, Aleppo, Syria on 1 November 2011, by Air Force Intelligence Branch of Aleppo, Syria;
- (l) Zaher Tabbakh allegedly arrested from Karamila Circle, Jaramana on 12 March 2013, by pro-Government militia currently known as the National Defence Forces;
- (m) Mohammad Al-Qaiyem, allegedly arrested from Al-Mazra'a checkpoint on Al-Wa'ar road in Homs, Syria in August 2013, by Government Forces;
- (n) Mohammad Raja'ie Khalou, allegedly arrested from in front of As-Salam Hospital, in Al-Qameshli on 25 June 2008, by an Air Force Intelligence patrol;
- (o) Hussien Alharish, allegedly arrested from a checkpoint on 3 February 2012, by members of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in Raqqa, Raqqa District, Raqqa Governorate, Syria;
- (p) Hussien Alewi allegedly arrested from Mhardeh Hama, Hama Governorate on 3 February 2012, by members of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 (q) Hasan Almasri allegedly arrested from Dabusia, Homs, Syria on 5 August 2014, by members of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 (r) Hosni Jom'a allegedly arrested from checkpoint on Damascus International Airport road, Damascus city, Damascus Governorate, Syria on 8 March 2013 members of the Air Security Forces;
- (s) Adnan Al Imam, allegedly arrested from 1 Moujtahed neighbourhood in Damascus City, Damascus Governorate, Syria on August 2013 by members of the State Security Forces;
- (t) Mohammad Deir Ba'labawi allegedly arrested from a checkpoint located at the entrance of Al Baath University, west of Homs city, Homs Governorate, Syria, on 2 June 2014, by members of the Military Security Forces;
- (u) Ebrahim Al-Jeadni allegedly arrested from Addra City on 3 January 2014, by members of the Syrian Army;
- (v) Ahmad Naser Al-Rejlea allegedly arrested from a checkpoint on Aqraba on 18 October 2013 by the Syrian Army;
- (w) Abdul Hameed Othman, allegedly arrested from a checkpoint near Aleppo, on 3 August 2013, by the Syrian Army;

- (x) Saad Balowaat allegedly arrested from Hama on 22 June 2011, by members of the Air-Intelligence Branch;
- (y) Ali Mahmoud allegedly arrested from a checkpoint in Al Saiyda Zainab, Damascus on 13 December 2013 by the Abu Al Fadel Al Abba Iraqi militias related to Government forces;
- (z) Faisal Al Eyadeh allegedly arrested from Al Hasakah District, Al Hasakah governorate, Syria on 4 September 2013 by the National Defence Militia related to Government forces;
- (aa) Ramiz Kordo, allegedly arrested from a checkpoint at Mount Simeon (Jabal Semaan) District, Aleppo Governorate, Syria on 22 November 2013 by armed members related to political security forces of Government Forces;
- (bb) Idreis Akram allegedly arrested from a checkpoint on the Al Amin street, Al Nabak City, Damascus suburbs, Syria on 24 November 2013 by armed members related to Army Forces of the Government;
- (cc) Asaad Al Mir allegedly arrested from downtown Damascus, Syria on 7 October 2013 by Governmental Security Forces;
- (dd) Hosam Knab allegedly arrested from Arbaeen Mountain, Hama Governorate, Syria on 5 September 2013 by the Syrian Army;
- (ee) Abdul Aleem Ahmad Deib, allegedly arrested from Al Hal Market in Harasta, Rif Damashq Governorate, Syria on 23 February 2014 by the Syrian Army;
- (ff) Anas Yaseen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the Criminal Security Branch in Sweida, as-Suwayda Governorate, Syria, on 21 April 2014, by members of the Security Services;
- (gg) Al Jaidani Ibrahim allegedly arrested from Adra, Syria on 3 January 2014, by members of the Syrian Army Forces;
- (hh) Anwar Akram Abdulsattar Al Khdairi allegedly last heard from on 18 November 2012 and reportedly being held in the Syrian Army Intelligence Prison in Maz Al Jabal;
- (ii) Layth Battal Khadim Al Janabi allegedly arrested from the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Passport in Rukn Al Din neighbourhood in Damascus, Syria on 20 June 2012, by Security Services;
- (jj) Saleh Al-Khader, allegedly arrested from Tala'e checkpoint, located in al-Joura neighbourhood, Deir ez-Zor, Syria on 18 July 2014, by Syrian Military Security Forces;
- (kk) Hussien Almandil, allegedly arrested from a checkpoint near Alrahman Mosque in Aleppo on 30 May 2013 by soldiers;
- (ll) Anas Halawa, allegedly last seen in Branch 248 of the Military Security Branch in Damascus in October 2014;
- (mm) Mohamed Albati, allegedly arrested from Tayyibat Al Imam, Hama, Syria on 28 April 2017 by Military Security Forces;
- (nn) Tamer Hammoush allegedly arrested from the eastern part of Al Furqan neighbourhood, Aleppo, Syria on 13 January 2014, by Air Security Forces;
- (oo) Badr Al Din Habib, allegedly arrested from checkpoint located in the Ramouse neighbourhood, Aleppo on 10 October 2014, by Military Security;
- (pp) Sohaib Haj Ali, allegedly arrested from al-Sabahi checkpoint, at the northern entrance of Aleppo Road on 18 April 2017, by members of the Political Security Branch;
- (qq) Mona Al Ahmad, allegedly arrested from the checkpoint of the Airforce Intelligence at Hama main road, Homs on 8 November 2014;
- (rr) Mahmoud Mohammad, allegedly arrested from Al Gharbi neighbourhood on 15 January 2015 by Syrian military forces;

(ss) Ahmad Alnmr allegedly arrested from Khaldiyah Village, Hama Governorate on 29 February 2014 by members of the military security;

(tt) Mahmmud Al Batee,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Maardas checkpoint on 3 October 2016 by State Security;

(uu) Fares Kharboutli, allegedly arrested from Qamishli, al-Hasakah governorate, Syria on 29 September 2013 by members of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vv) Ali Al Qasim, allegedly arrested from Deir Ba'alba neighbourhood, Homs city, Syria on 3 January 2013, by political security forces of the Government.

Annex IV

Respuesta del Estado de El Salvador a dos alegaciones generales formuladas por el Grupo de Trabajo sobre Desapariciones Forzadas o Involuntaria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l Estado de El Salvador, presenta su informe al Grupo de Trabajo sobre Desapariciones Forzadas o Involuntaria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n atención a alegaciones generales contra El Salvador realizadas en el año 2015, y reiteradas en mayo del presente año, relativas a denuncias sobre falta de diligencias en las investigaciones y obstáculos que las familias de las personas desaparecidas durante el conflicto armado interno han enfrentado para dar con el paradero de sus seres queridos.

A. Resumen de las alegaciones

En la primera Alegación General, de fecha 31 de marzo de 2015, se expresa que la Fiscalía General de la República necesitaba mostrar más dinamismo en las investigaciones de los casos de desaparición forzada; que la Corte Suprema de Justicia (CSJ) no había concretado la coordinación ofrecida para lograr un acuerdo entre la Junta Directiva del Instituto de Medicina Legal (IML) y el Equipo Argentino de Antropología Forense (EAAF), con el fin de realizar en forma conjunta el trabajo relacionado con la ejecución de las exhumaciones ordenadas por la Corte Interamericana de Derechos Humanos (Corte IDH) en el caso “Masacre de El Mozote y lugares aledaños”, y como resultado, las exhumaciones ordenadas por la Corte IDH no se habían realizado a esa fecha; y que la Comisión Nacional de Búsqueda de Niñas y Niños Desaparecidos Durante el Conflicto Armado a septiembre de 2014, únicamente había resuelto 39 casos de un total de 236.

Además, que la Ley de Amnistía General para la Consolidación de la Paz seguía vigente, pese a que la Sala Constitucional de la Corte Suprema de Justicia (CSJ) aprobó una petición presentada en marzo 2013 reclamando la inconstitucionalidad de la Ley de Amnistía. No obstante la decisión continuaba pendiente.

En la segunda Alegación General, de fecha 25 de junio de 2015, el Grupo de Trabajo manifestó haber recibido información relacionada con la presunta pasividad y omisión en la exhaustiva y debida diligencia en la investigación de casos de desapariciones forzadas. Señalando en particular las denuncias interpuestas en 2006 por familiares de personas desaparecidas durante el conflicto armado ante la Fiscalía General de la República (FGR) y luego mediante un recurso de habeas corpus ante la Corte Suprema de Justicia (CSJ). Además, que en 2014, la FGR habría constatado que no tenía la documentación referente a las denuncias de 2006, por lo cual los familiares de las víctimas habrían tenido que proporcionar la documentación pertinente a las autoridades; y que las únicas diligencias realizadas en estos casos por la FGR, fue asignar las investigaciones a la Unidad Anti Homicidios y nombrar a los investigadores policiales.

Asimismo, mencionó los obstáculos enfrentados por migrantes desaparecidos y sus familiares, así como el escaso apoyo del Estado frente a esta situación, haciendo referencia a 350 casos de desapariciones de migrantes en su ruta desde El Salvador hacia los Estados Unidos, durante la cual habrían sido víctimas de desapariciones o de asesinatos y/o ejecuciones en el territorio de México. En algunos de estos casos la FGR habría respondido que no podía recibir las denuncias de las desapariciones dado que los hechos habían ocurrido en territorio Mexicano; por lo que sugerían impulsar un mecanismo transnacional para facilitar el acceso a la justicia de los migrantes víctimas de desaparición y de sus familiares.

Agregaron, que en la actualidad existían nuevas formas de desaparición forzada en El Salvador, las que ocurrían en un contexto de violencia y de impunidad que tendría su origen en el crimen organizado; que tenían conocimiento de un incremento de desapariciones en el país y de cementerios clandestinos, y que según las cifras disponibles el número de personas desaparecidas en 2011 y 2012 habrían superado los casos de desaparición forzada

de niños/as durante el conflicto armado, registrados por organizaciones de la sociedad civil. Varios de los casos habrían sido presuntamente cometidos por miembros de las Fuerzas Armadas en el marco de tareas que pretenden llevar seguridad a las comunidades.

Finalmente, manifestaron su preocupación por la inexistencia de una política estatal de búsqueda de personas desaparecidas, que implique el trabajo coordinado de las instituciones pertinentes. La falta de coordinación se evidenciaría por las disparidades entre los datos estadísticos que podían consultarse sobre el número de personas desaparecidas. Además, la Unidad de Búsqueda de Personas Desaparecidas de la Policía Nacional Civil (PNC), aplicaría una búsqueda exhaustiva solo si los casos corresponden a la categoría de “casos prioritarios”; que según el Instructivo de Investigaciones de Personas Desaparecidas y Extraviadas aprobado por la PNC en junio 2012, los casos que se consideraban importantes y que debían ser investigados con prioridad eran: la desaparición de autoridades públicas, de funcionarios públicos, de extranjeros con misión diplomática, de policías y militares, y casos que causen alarma y conmoción nacional.

En ambas alegaciones, el Grupo de Trabajo adjuntó 2 listados de personas desaparecidas cuyas investigaciones no habrían sido agilizadas por parte de la FGR; uno de los listados contenido en los casos de personas desaparecidas en el contexto del conflicto armado interno y el otro, casos actuales de desaparición forzada. Asimismo, solicitó dar respuesta al siguiente cuestionario:

1. Si los hechos relatados en la denuncia son exactos. Si no es así, por favor aclarar;
2. ¿Qué investigaciones específicas se están realizando con el fin de enjuiciar a los presuntos autores de las desapariciones forzadas o involuntarias?
3. ¿Cuáles son las medidas concretas adoptadas por el Gobierno de Su Excelencia para prevenir y poner fin a los casos de desaparición forzada?
4. ¿Cuáles son los pasos específicos que el Gobierno de Su Excelencia está llevando a cabo para ayudar a las familias para determinar la suerte o el paradero de sus seres queridos?
5. ¿Cuáles son los pasos específicos que el Gobierno de Su Excelencia está llevando a cabo para proporcionar reparaciones a las familias de las personas desaparecidas?
6. Sírvase proporcionar información sobre instancias de cooperación regional en relación a la desaparición de migrantes;
7. Respecto a las desapariciones actuales, deseamos contar con mayor información respecto al Instructivo de Investigaciones de Personas Desaparecidas y Extraviadas aprobado por la PNC en junio 2012 y la definición de “casos prioritarios” incluida en el mismo.

B. Respuesta del Estado

Sobre la pregunta 1: “Si los hechos relatados en la denuncia son exactos. Si no es así, por favor aclarar”:

El Estado de El Salvador considera que los hechos relatados en ambas alegaciones generales de 2015 y reiteradas en mayo de 2018, no son exactos a la realidad actual del país y por lo tanto se hacen las siguientes puntualizaciones:

(a) Respecto de la no suscripción del “Convenio de Cooperación Científica entre la Corte Suprema de Justicia y el Equipo Argentino de Antropología Forense (EAAF)”, es preciso aclarar que el citado convenio sí fue suscrito en el año 2016, con el objeto de promover y desarrollar instancias de cooperación científica, especialmente en materia forense, tales como: arqueología forense, antropología científica, odontología forense, medicina legal, evidencias sociales, genética forense, entre otras; asimismo, de crear programas y/o actividades de estudio, capacitaciones presenciales y/o a distancia, visitas de estudio, intercambio de material bibliográfico y de protocolos para el desarrollo de buenas prácticas y el mejor abordaje del trabajo pericial, pasantías tanto en El Salvador como en la

sede del EAAF, y cualquier actividad que permita a ambas instituciones, la promoción y contribución al desarrollo y mejoramiento de todas las especialidades forenses como herramienta de la investigación científica – criminal en el país; y también de formación y actualización de técnicas modernas de las áreas forenses y en aquellas otras relacionadas a la investigación de delitos, como el Programa de Formación de Especialidad en Medicina Legal para docentes y promover instancias de cooperación en la búsqueda de las personas desaparecidas y en casos de fallecimiento, exhumaciones, identificación y la restitución de restos humanos.

A raíz de la firma de este Convenio, se realizaron las exhumaciones ordenadas por la Corte IDH en el caso “Masacre de El Mozote y lugares aledaños”, entre el 10 de noviembre y el 10 de diciembre de 2016, a requerimiento de la FGR y bajo la autorización jurisdiccional del Juez de Paz de Meanguera, Departamento de Morazán. En el primer trimestre de 2017 se llevó a cabo el trabajo de identificación científica de los restos exhumados, a través de la etapa antropológica y de laboratorio. Para la ejecución de esta diligencia judicial, se contó con el trabajo conjunto del personal del Departamento de Antropología Forense del Instituto de Medicina Legal “Dr. Roberto Masferrer” (IML), de agentes de la División Central de Investigaciones (DCI) de la Policía Nacional Civil, de peritos de la División de Policía Técnica y Científica (DPTC), así como con la valiosa colaboración de expertos del Equipo Argentino de Antropología Forense (EAAF).

Durante este procedimiento se logró recolectar una buena cantidad de evidencia física y la extracción de osamentas humanas, a las que se les realizó el respectivo análisis científico, para posteriormente ser entregados a sus familiares y representantes de las víctimas del caso. Actualmente, pero bajo el control jurisdiccional del Juzgado de Primera Instancia de San Francisco Gotera, Departamento de Morazán, la FGR continúa recabando información testimonial en el caso de la referida masacre, sobre nuevos sitios en los que podrían encontrarse restos humanos a exhumar.

En relación a este mismo punto, debe señalarse que a pesar de reconocer el aporte fundamental que el EAAF ha brindado al país para la investigación de casos como El Mozote, la prioridad estatal está centrada en la generación de capacidades institucionales, por lo que actualmente se está trabajando en la creación del Equipo Salvadoreño de Antropología Forense (ESAF), para lo cual ya existe un acuerdo emitido por el Consejo Directivo del Instituto de Medicina Legal “Dr. Roberto Masferrer”. Además, el Estado ha suscrito el Estatuto de la Comisión Internacional sobre Personas Desaparecidas y se encuentra en consideración de la Asamblea Legislativa para su posible ratificación, lo que facilitaría la gestión de cooperación técnica.

(b) En relación a los casos de desaparición forzada investigados por la Comisión Nacional de Búsqueda de Niños y Niñas Desaparecidas durante el Conflicto Armado (CNB) a septiembre de 2014, es necesario precisar que según los datos oficiales, desde el inicio de sus labores en septiembre de 2011 hasta marzo de 2015, la CNB registró un total de 253 casos, de los cuales había investigado 184 y resuelto 55; de estos, 30 jóvenes fueron localizados y reencontrados o en proceso de reencuentro con sus familias biológicas, 15 fueron localizados fallecidos y 10 casos fueron cerrados por diferentes razones.

A mayo de 2018, la CNB registra un total de 315 casos, de los cuales ha investigado 244 y resuelto 91; de estos, 46 jóvenes han sido localizados y reencontrados o se encuentran en proceso de reencuentro con sus familias biológicas, 31 fueron localizados fallecidos y 14 casos fueron cerrados por distintas causas. Lo que en suma refleja que de los casos investigados por la CNB, el 37 % cuenta con una conclusión investigativa.

(c) En torno la vigencia de Ley General de Amnistía para la Consolidación de la Paz, se comunica que en fecha 13 de julio de 2016, la Sala de lo constitucional de la Corte Suprema de Justicia, mediante sentencia 44-2013/145-2013, declaró la inconstitucionalidad de dicha Ley y ordenó su respectiva expulsión del ordenamiento jurídico nacional. Como producto de la referida sentencia, se abrió la posibilidad de iniciar o reabrir casos sobre delitos cometidos en el contexto del conflicto armado interno, entre ellos los de desaparición forzada. Consecuentemente, la FGR creó el Grupo de Fiscales para la Investigación de Delitos Cometidos en el Conflicto Armado, encargado de dirigir y coordinar las respectivas investigaciones a nivel nacional, contando con el apoyo de las 19

Oficinas Fiscales que tramitan las investigaciones en sus circunscripciones territoriales. Dicho Grupo Especializado está conformado actualmente por 4 fiscales auxiliares y dos asistentes administrativos.

(d) Respecto de la pasividad de la FGR en la investigación de casos de desaparición forzada. En relación al listado de personas desaparecidas en el contexto del conflicto armado interno, de acuerdo a información provista por la FGR, a la fecha no ha sido posible procesarlo en el sentido de recabar la información correcta sobre la situación actual de cada uno de los casos planteados por el Grupo de Trabajo, debido principalmente al volumen de la información a consultar (2,381 casos remitidos) y a la ausencia de registros automatizados en la década de 1980, lo que ha obligado a realizar una búsqueda manual de la información, sin el uso de las herramientas informáticas actuales; razón por la cual, con posterioridad, el Estado se pronunciará sobre este listado específico.

Sobre el listado de casos más recientes, se adjuntan al presente informe dos cuadros que contienen la información recabada en el Sistema de Información y Gestión Automatizada del Proceso Fiscal (SIGAP), referidos a datos estadísticos sobre los delitos de Desaparición Forzada de Personas (Art. 364 C. Pn.), Desaparición Forzada Cometida por Particular, (art. 365 C. Pn.) y Desaparición de Persona Cometida Culposamente (art. 366 C. Pn.), fechados en los años 2015, 2016, 2017 y 2018, desagregándolos en los rubros siguientes: casos iniciados, casos archivados, casos en investigación activa y casos finalizados (Anexo 1).

(e) En relación a los obstáculos enfrentados por los familiares de migrantes desaparecidos, es necesario informar que El Salvador sí tiene un mecanismo interinstitucional para la localización de personas migrantes desaparecidas, creado el 25 de agosto de 2010; además, cuenta con el Banco de Datos Forenses de Migrantes No Localizados. Ambos mecanismos son producto de la suscripción del “Acuerdo de cooperación interinstitucional para la creación de mecanismos de intercambio de información sobre migrantes no localizados y cuerpos no identificados”, por parte del Viceministerio para Salvadoreños en el Exterior, la Procuraduría para la Defensa de los Derechos Humanos (PDDH), la Asociación Comité de Familiares de Migrantes Fallecidos y Desaparecidos de El Salvador (COFAMIDES) y el Equipo Argentino de Antropología Forense (EAAF). El mecanismo tiene como finalidad la búsqueda internacional y localización de migrantes salvadoreños desaparecidos y fallecidos en territorios extranjeros que conforman la ruta del migrante, del cual se auxilia la Unidad Fiscal Especializada de Delitos de Tráfico Ilegal y Trata de Personas.

Una vez conocido un caso, se activa el citado mecanismo iniciando el contacto con COFAMIDES o con la PDDH, quienes explican a los familiares de la persona migrante desaparecida el protocolo a seguir para la donación de una muestra de ADN por parte del familiar más cercano. Asimismo, se les explica la naturaleza y funcionamiento del banco de datos forenses de migrantes no localizados, que permite la comparación de las muestras de ADN con restos humanos que no han sido identificados en territorio extranjero. Durante 2016 y 2017 la aludida Unidad Fiscal, sostuvo coordinaciones interinstitucionales con funcionarios de la PDDH para garantizar eficacia en la derivación y atención de familiares de víctimas desaparecidas y fallecidas en la ruta del migrante hacia los Estados Unidos de América.

Asimismo, el Min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como parte de la protección consular y con el objetivo de brindar tutela efectiva y sistemática a la población migrante en tránsito, ha establecido agencias consulares en los puntos y en zonas determinadas como rutas migratorias, que brindan asistencia, acompañamiento y ayuda humanitaria ágil, flexible y en cualquier momento a estas personas, especialmente a niñas, niños y adolescentes. En ese sentido, la red consular ha sido fortalecida, instalando el Consulado en Mc Allen, Estados Unidos y recientemente en San Luis Potosí, México.

(f) En relación a los casos en los que según la denuncia hecha al Grupo de Trabajo, la Fiscalía General de la República habría expresado a las víctimas o familiares, que no era posible recibir la denuncia sobre una persona migrante desaparecida, debido a que los hechos harían ocurrido en territorio mexicano, se informa que la Unidad Especializada de Delitos de Tráfico Ilegal y Trata de Personas de la FGR posee claridad de la competencia legal determinada por el artículo 9 numeral 3 y el artículo 10 del Código

Penal de El Salvador, referentes respectivamente al “Principio Personal o de Nacionalidad” y al “Principio de Universalidad”, y que los delitos de Tráfico Ilegal y Trata de Personas son tipos penales pluriofensivos, que afectan bienes jurídicos protegidos universalmente, constituyendo delitos contra la humanidad, por lo que en tal sentido, con frecuencia se reciben denuncias en que parte o la totalidad de los hechos habrían ocurrido en territorios extranjeros, como es el caso del delito de Tráfico Ilegal de Personas; en estos casos, incluso, para garantizar la recolección oportuna de elementos de prueba, también se tramitan asistencias internacionales a diversos países a través de la Unidad de Asistencia Legal Internacional de la Fiscalía.

(g) Respecto de la alegación que detalla que la Unidad de Búsqueda de Personas Desaparecidas de la Policía Nacional Civil (PNC) aplicaría una búsqueda exhaustiva solo si los casos corresponden a la categoría de “prioritarios, según lo contemplado en el Instructivo de Investigación de Personas Desaparecidas del año 2012”, es necesario aclarar que en tal instructivo policial no existe la categoría “prioritarios” y que la atención de cada caso reviste igual importancia en cualquier unidad policial donde el hecho sea reportado.

(h) En relación a la ausencia de políticas públicas en el tema de desaparición forzada de personas, es preciso mencionar que el Plan Quinquenal de Desarrollo 2014–2019 del Gobierno de El Salvador, que es el instrumento de política pública de más alto nivel en el país, contempla en sus apartados A.1 y E.11.6, el enfoque de cumplimiento y promoción de los derechos humanos, el cual dicta las directrices necesarias para la creación de políticas específicas en el tema de reparación a víctimas de graves violaciones a los derechos humanos, entre las que se encuentran las de desaparición forzada de personas.

En cumplimiento de esta política pública, es que se concreta la instalación del Consejo Directivo del Registro de Víctimas de Graves Violaciones a Derechos Humanos Ocurridas en el Contexto de Conflicto Armado Interno (CODREVIDH), en julio de 2014; se lanza oficialmente el programa de “Transferencia Monetaria para Víctimas de Graves Violaciones a Derechos Humanos durante el Conflicto Armado”, en agosto de 2016; y se crea la Comisión Nacional de Búsqueda de Personas Adultas Desaparecidas en el Contexto del Conflicto Armado de El Salvador (CONABÚSQUEDA), en septiembre de 2017. Mecanismos que se detallarán más adelante.

Sobre la pregunta 2: ¿Qué investigaciones específicas se están realizando con el fin de enjuiciar a los presuntos autores de las desapariciones forzadas o involuntarias?:

En cuanto a investigaciones específicas sobre casos de desaparición forzada de personas ocurridas en el contexto del conflicto armado interno, se pueden citar algunos que actualmente están siendo diligenciados: caso Guzmán, caso Flores, caso Escobar, caso Reyes, caso Morán, caso La Gruta y caso Sánchez. Hechos ocurridos en el contexto del conflicto armado interno en diferentes lugares del país y atribuidos tanto a la Fuerza Armada como a grupos revolucionarios. Asimismo, se investigan casos relacionados a homicidios, masacres, atentados con artefactos explosivos a instalaciones sindicales, reclutamientos forzosos, entre otros, también ocurridos en el contexto del pasado conflicto armado.

Todos estos casos están siendo investigados por la Policía Nacional Civil en cumplimiento a direccionamiento funcional de la FGR. Para atender los requerimientos fiscales, la institución policial ha dispuesto equipos de investigación a nivel nacional, distribuidos en cada Departamento de Investigación Policial y en la División Central de Investigaciones de la PNC.

Los equipos de investigadores cuentan con el apoyo de analistas operativos de casos y de peritos de la División de Policía Técnica y Científica; así también, con el apoyo logístico necesario para el desarrollo de sus actividades. Adicionalmente, se mantienen una estrecha relación con el fiscal asignado al caso, para planificar actividades a realizar y analizar el resultado de las mismas.

En relación a la pregunta 3: ¿Cuáles son las medidas concretas adoptadas por el Gobierno de Su Excelencia para prevenir y poner fin a los casos de desaparición forzada?:

(a) El Código Penal salvadoreño contempla como Delitos Contra la Humanidad, tres Tipos Penales referidos a desaparición forzada: Desaparición Forzada de Personas, Art. 364; Desaparición Cometida por Particular, Art. 365; y Desaparición de Personas Permitida Culposamente Art. 366. Por lo tanto, una vez que la FGR tiene conocimiento de un hecho delictivo que agravia uno o más bienes jurídicos protegidos en los señalados tipos penales, se inicia la investigación criminal correspondiente, garantizando la legalidad y la búsqueda de la verdad real.

(b) 13 de julio de 2016, la Sala de lo Constitucional de la Corte Suprema de Justicia, mediante sentencia 44-2013/145-2013, declaró la inconstitucionalidad la Ley de Amnistía General para la Consolidación de la Paz y ordenó su respectiva expulsión del ordenamiento jurídico nacional; lo que abre la posibilidad e investigar y enjuiciar a los responsables por crímenes de lesa humanidad, como la desaparición forzada de personas ocurridas en el contexto del pasado conflicto armado salvadoreño.

(c) En cuanto al tema de difusión y sensibilización en torno a la problemática de niñez desaparecida, la CNB realiza una publicación semestral de la revista “Re-Cordis”, además de cuñas radiales, comunicados y conferencias de prensa para informar a la población sobre el tema. Adicionalmente, se utilizan como herramientas de difusión, el sitio web institucional, las redes sociales, y el canal de videos por internet de YouTube. Específicamente sobre el tópico de sensibilización de la población en general, la CNB destaca que en diciembre de 2012 inició la campaña radial “Unámonos para el Reencuentro”, la cual fue desarrollada a lo largo del año 2013 y generó que se recibieran nuevas solicitudes de investigación de casos. De igual manera, con la finalidad de hacer visible y presente el tema de niñez desaparecida, en ese mismo año realizó la exposición fotográfica “Ecos de la Memoria”, con fotografías de niñas y niños desaparecidos en el contexto del conflicto armado salvadoreño; la cual fue presentada en la ciudad capital y lugares del interior del país.

(d) La PNC participa de la Mesa Técnica de Fortalecimiento Interinstitucional en casos de personas desaparecidas relacionadas en el crimen organizado, para reducir la impunidad en El Salvador, donde se exponen las diferentes inquietudes y problemáticas de la PNC, FGR e IML, logrando establecer procedimientos conjuntos para el trabajo que involucra a las tres instituciones.

(e) A la fecha, la PNC está a la espera de la aprobación de un instructivo con el que se actualizará el procedimiento de actuación para las dependencias policiales en materia de investigación efectiva y registro de información fiable sobre casos de personas desaparecidas.

Sobre la pregunta 4: ¿Cuáles son los pasos específicos que el Gobierno de su Excelencia está llevando a cabo para ayudar a las familias a determinar la suerte o e/paradero de sus seres queridos?:

(a) Mediante el Decreto Ejecutivo No. 5, publicado en el Diario Oficial el día 18 de enero del 2010 y reformado mediante el Decreto N. 45, del 26 de abril del mismo año, se creó la Comisión Nacional de Búsqueda de Niñas y Niños Desaparecidos durante el Conflicto Armado Interno (CNB), en cumplimiento de la Sentencia emitida por la Corte Interamericana de Derechos Humanos el 1º de marzo de 2005, en el caso de las hermanas Ernestina y Erlinda Serrano Cruz, quienes desaparecieron de manera forzada en 1982. La CNB inició sus labores operativas en agosto de 2011.

(b) En 2016, como producto de la declaratoria de inconstitucionalidad de la Ley General de Amnistía para la Consolidación de la Paz, la FGR creó el Grupo de Fiscales para la Investigación de Delitos Cometidos en el Conflicto Armado, encargado de dirigir y coordinar las respectivas investigaciones a nivel nacional, entre los cuales se encuentran desapariciones forzadas de personas. Este grupo especializado cuenta con el apoyo de las 19 Oficinas Fiscales que tramitan las investigaciones en sus circunscripciones territoriales. Dicho Grupo Especializado está conformado actualmente por 4 fiscales auxiliares y dos asistentes administrativos.

(c) En septiembre de 2017, mediante Decreto Ejecutivo No. 33, el Gobierno de El Salvador creó la Comisión Nacional de Búsqueda de Personas Adultas Desaparecidas en el Contexto del Conflicto Armado de El Salvador (CONABÚSQUEDA), la cual está dirigida por tres comisionados nombrados por el Órgano Ejecutivo, pero 2 de ellos propuestos por las víctimas. Esta Comisión, al igual que la CNB, ha sido dotada de recurso humano y financiero para su funcionamiento.

(d) Con relación a avances en el tema de reconocimientos, identificación de restos, excavaciones y exhumaciones, el Instituto de Medicina Legal “Dr. Roberto Masferrer” (ILM), con el apoyo del EAAF y técnicos auxiliares, a la fecha han identificado 26 sitios de excavación de los cuales se han exhumado 70 personas desaparecidas que ya han sido identificadas y entregados sus restos a las familias, con lo cual algunos casos ya fueron concluidos. Asimismo, se han analizado 41 muestras de sangre de posibles familiares para la identificación de osamentas exhumadas, contando con los registros de familiares en la Base de Datos Ante Mortem / Post Mortem del ILM; en total han sido analizadas 68 muestras, todas ellas procesadas mediante la extracción, cuantificación y amplificación por medio de la Reacción en Cadena de la Polimerasa y secuenciación capilar en analizadores genéticos Thermo Fisher 3130 y 3500 XL, utilizando el Software Genemapper V.1.4.; los Kits marcadores genéticos ocupados para el análisis fueron GlobalFiler, GlobalFiler Express Identifier y Minifiler.

Recientemente, personal del ILM recibió formación especializada sobre la extracción de DNA en muestras óseas de larga data; dicha capacitación fue impartida por el Centro de Identificación Humana de la Universidad del Norte de Texas y por ex miembros del Laboratorio de Genética del FBI, lo que ha permitido implementar nueva metodología y optimizar recursos dentro del ILM y volver más eficientes sus procesos. Además, en este momento el IML cuenta con el Software M-FISys v.11.07 para el análisis de bases de datos en casos de personas desaparecidas, el cual se encuentra listo para operar una vez que la CSJ en Pleno autorice la creación de una nueva base de datos sistematizada.

En la actualidad, el IML se encuentra colaborando activamente con la Comisión Nacional de Búsqueda de Niños y Niñas Desaparecidos durante el Conflicto Armado Interno (CNB) y con la Comisión Nacional de Búsqueda de Personas Adultas Desaparecidas en el Contexto del Conflicto Armado de El Salvador (CONABÚSQUEDA), ambas creadas por el Órgano Ejecutivo.

(e) En el tema de niñez desaparecida, el Min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y el Instituto de Medicina Legal de la Corte Suprema de Justicia, tienen proyectada la creación de un Banco Nacional de Perfiles Genéticos, para cuyo propósito se han establecido las coordinaciones necesarias, así como los estudios y las valoraciones pertinentes que posibiliten su instalación en el mediano plazo.

(f) Actualmente, la Sala de lo Constitucional de la Corte Suprema de Justicia ha gestado avances y modificaciones en los criterios jurisprudenciales referente a la desaparición forzada ocurrida en el contexto de la guerra civil salvadoreña desarrollada desde 1980 hasta 1992, época en la que no se aceptaba el hábeas corpus como mecanismo idóneo para conocer estos casos. Dichos criterios han sido superados por la Sala, concluyendo que este proceso constitucional es un mecanismo idóneo para conocer casos de desaparición forzada ocurridas en el contexto del conflicto armado interno.

Respecto de la pregunta 5: ¿Cuáles son los pasos específicos que el Gobierno de su Excelencia está llevando a cabo para proporcionar reparaciones a las familias de las personas desaparecidas?:

(a) Mediante Decreto Ejecutivo N° 57, de fecha 05 de mayo de 2010, se creó la “Comisión Nacional de Reparación a las Víctimas de Violaciones a los Derechos Humanos, ocurridas durante el Contexto del Conflicto Armado Interno”, procurando ajustarse a los estándares d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de los derechos humanos en cuanto al deber de reparación de naturaleza colectiva. Esta Comisión propuso un Programa de Reparaciones a las Víctimas de Graves Violaciones a los Derechos Humanos Ocurridas en el contexto del Conflicto Armado Interno, contenido en medidas en el ámbito de la salud, la educación, alimentación y de participación en la vida económica.

Durante los años 2011 y 2012, el Estado realizó un registro de víctimas de graves violaciones a derechos humanos durante el conflicto armado interno, que ha sido la base para la implementación del referido Programa de Reparación.

(b) A través del Decreto Ejecutivo 204, de fecha 23 de octubre del año 2013, se creó de manera oficial el “Programa de Reparaciones a las Víctimas de Graves Violaciones a los Derechos Humanos Ocurridas en el Contexto del Conflicto Armado Interno” y además, el Consejo Directivo del Registro de Víctimas de Graves Violaciones a los Derechos Humanos Ocurridas en el Contexto del Conflicto Armado Interno (CODREVIDH).

El objeto del Programa de Reparaciones es dotar a las víctimas de graves violaciones a derechos humanos y a sus familiares, de diferentes mecanismos de reparación por los daños sufridos durante el conflicto armado; contemplando las siguientes modalidades de reparación: Medidas de Rehabilitación, Indemnización, Medidas de Dignificación, y Medidas de Garantía de No Repetición de los hechos. Este Decreto establece obligaciones específicas a las instituciones del Órgano Ejecutivo, en materia de cumplimiento de las medidas de reparación, según la competencia correspondiente.

El referido Consejo Directivo tiene como funciones generales, organizar, administrar, dirigir y garantizar el correcto funcionamiento y resguardo de la información del Registro de Víctimas de Graves Violaciones a los Derechos Humanos Ocurridas en el Contexto del Conflicto Armado Interno, con la finalidad de garantizar la correcta identificación de las víctimas y su incorporación en las diferentes medidas de reparación contempladas en el Decreto Ejecutivo 204.

En observancia del Programa de Reparaciones contemplado en el Decreto Ejecutivo 204, el 31 de agosto de 2016 la Presidencia de la República lanzó de manera oficial el programa de “Transferencia Monetaria para Víctimas de Graves Violaciones a Derechos Humanos durante el Conflicto Armado”, que consiste en un apoyo económico de entrega bimensual con finalidad compensatoria y de carácter continuo, el cual es entregado a las víctimas identificadas en el respectivo Registro.

(c) Como se mencionó previamente, El Salvador ha logrado avances en el tema de reconocimientos, identificación de restos, excavaciones y exhumaciones de personas desaparecidas. A la fecha, el Instituto de Medicina Legal “Dr. Roberto Masferrer” (ILM), con el apoyo del EAAF y técnicos auxiliares, han identificado 26 sitios de inhumación de los cuales se han exhumado 70 personas desaparecidas que ya han sido identificadas y entregados sus restos a las familias, con lo cual algunos casos ya fueron concluidos, lo que ha contribuido en el tema de reparación a las víctimas.

(d) En el caso de niñez desaparecida, la CNB ofrece apoyo y acompañamiento psicosocial a la familia de las niñas y niños desaparecidos, y de manera especial en aquellos casos donde las personas desaparecidas han sido localizados como fallecidas y se conoce el lugar del entierro, dando acompañando al proceso de exhumación de los restos; asimismo, realiza visitas familiares que permiten contextualizar las historias y las etapas vividas por las familias y realiza talleres psicosociales con diferentes grupos familiares a fin de propiciar el reconocimiento de la afectación del trauma psicosocial producto de la desaparición forzada.

En relación a la pregunta 6: Sírvase proporcionar información sobre instancias de cooperación regional en relación a la desaparición de migrantes.

En los casos de investigación, la PNC se apoya de OCN-INTERPOL y de la red consular del Min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A partir de septiembre de 2017, la PNC ha desarrollado diferentes talleres con equipos de trabajo técnicos, apoyados por la Oficina de las Naciones Unidas contra la Droga y el Delito (UNODC) y el Gobierno de Canadá, con el propósito de lograr el fortalecimiento institucional en casos de desapariciones relacionadas con el crimen organizado, entre los cuales también figuran algunas desapariciones de migrantes.

Sobre la pregunta 7: Respecto de las desapariciones actuales, desearíamos contar con mayor información respecto al instructivo de investigaciones de personas desaparecidas y extraviadas aprobado por la PNC en junio de 2012, y la definición de “casos prioritarios” incluida en el mismo:

En el año 2011, se creó el Grupo de Investigación de Personas Desaparecidas dentro de la División Central de Investigaciones de la PNC, con el objeto de ser un referente investigativo policial en materia de investigación de casos de desaparición forzada de personas, manteniendo a la vez una estructura investigativa de atención de casos a nivel departamental, lo cual permite una atención de tipo centralizada y descentralizada.

El instructivo al cual se hace referencia establece el funcionamiento y los mecanismos de coordinación entre la unidad centralizada y las unidades descentralizadas, para poder dar una mejor atención a las víctimas y sus familiares, tener mejores registros estadísticos y dar un adecuado seguimiento a los casos.

Como se mencionó en el punto 1, el documento no hace referencia a casos “prioritarios”, por tanto no es posible dar una definición sobre ese término.

El instructivo define la forma de distribuir y asignar los casos de acuerdo a criterios de participación en las Unidades Policiales intervinientes, basados en la complejidad que reviste la investigación, ya sea por las características del grupo criminal involucrado, la transversalidad del hecho, o la cercanía de la unidad policial respecto del lugar en que sucedieron los hechos, entre otros.

Aclaración del Estado de El Salvador sobre presentación de informes solicitados por el Grupo de Trabajo

En reiteradas oportunidades, el Grupo de Trabajo sobre Desapariciones Forzadas de Personas ha comunicado al Estado de El Salvador que no ha dado respuesta a los informes solicitados en el año 2014 y 2015; ante lo cual se hace necesario informar a ese honorable Grupo de Trabajo, que el Estado salvadoreño ha brindado respuesta a todas las solicitudes de información efectuadas en los referidos años; agregando como prueba copia de los informes rendidos (Anexos 2 y 3).

Antiguo Cuscatlán, 6 de noviembre de 2018
